

上海论坛动态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www.shanghaiforum.org

第6卷 第3期 (总第24期)

2013.10

新闻

- > 上海论坛(2013)隆重开幕
- > 上海论坛(2013)总结会
- > 第九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聚焦

- > 上海论坛(2013)开幕式大会致辞与演讲
- > 闭幕式大会致辞与演讲

专题

- > 上海论坛(2013)嘉宾访谈
- > 嘉宾建言
- > 分论坛观点集萃

共识

- > 上海论坛(2013)共识

信息

- > 上海论坛(2014)主题



上海论坛动态

《上海论坛动态》是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的公开出版物。其目标是扩大上海论坛在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其内容涉及新闻发布、论坛专题、相关活动、重要事项和进程等，并对论坛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以促进上海论坛的更好发展。

主办方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编委会

主任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朱之文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主编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

执行副主编

陈寅章 复旦大学校长外事顾问
张怡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康泰硕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部长

副主编 (以姓氏字母为序)

陈诗一 复旦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
侯杨方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姜义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分党委书记
金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行政室室长
李良荣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维森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彭希哲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钱序 复旦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
任远 复旦大学国家建设中心执行主任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笑侠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宋恩荣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
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中祥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学系系主任

责任编辑

罗倩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沈天音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执行编辑

李明镇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科长
吴涛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钱斯蕴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丁常昕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黄昊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徐晓羽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黄晨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沈婵婧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姚思文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目 录

第6卷 第3期 (总第24期) 2013.10

02 新闻

上海论坛 (2013) 隆重开幕
上海论坛 (2013) 总结会
第九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06 聚焦

开幕式大会致辞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崔泰源 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朴仁国代为发言)
翁铁慧 上海市副市长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Robert Zoellick 第十一任世界银行集团总裁
方星海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Michael H. Merson 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
Robert A. Mund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樊勇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

闭幕式大会演讲

Andreas Löschel 德国国家能源转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
Hélène Rey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闭幕式大会致辞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34 专题

嘉宾访谈

Robert A. Mundell : 我们重新回到了缺少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
Robert Zoellick : 洞察中美关系
Michael Merson : 防治慢性病, 亚洲需吸取西方教训
Andreas Löschel : 中国在全球污染问题上可能是领跑者
Hélène Rey : 世界金融体系正逐渐趋于多元化

嘉宾建言

Robert A. Mund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obert Zoellick 第十一任世界银行集团总裁
Alessandra Guariglia 伯明翰大学经济系主任
叶兆辉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
李碧建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参赞

分论坛观点集萃

Tae Yong AHN 韩国法务法人正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Kirill Barskiy 俄罗斯外交部官员
陈向明 芝加哥大学伊利诺斯分校教授
陈学彬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Keith Crane 美国兰德公司环境、能源和经济发展项目主任
高津华 上海财向私募股权投资平台执行合伙人兼总裁
Hans Genbe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局长
何明升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姜义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孔灵芝 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孟睿思 哈佛商学院教授
Jose Antonio Puppim De Oliveira 联合国大学高级研究员
Jeffrey Schott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万广华 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叶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
张文朗 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61 上海论坛共识

上海论坛 (2013) 共识

64 信息

上海论坛 (2014) 主题



P02



P03



P04

上海论坛（2013）隆重开幕



“作为国内知名的年度综合性国际学术论坛之一，上海论坛（2013）于5月2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汇聚了来自各国政、商、学界的500余位杰出人士，共同为上海、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建言献策，致力于促进亚洲与世界的在多元中实现和谐发展的愿景，为亚洲与全球经济社会勾勒美好的发展蓝图。”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她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与会嘉宾光临上海表示欢迎，并祝愿上海论坛（2013）取得圆满成功。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之文主持了当天的开幕式。韩国SK经营经济研究所总裁黄奎昊、SK中国总裁孙子强出席了开

幕式。

开幕式上，世界银行前总裁 Robert Zoellick，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obert Mundell，美国杜克大学副校长 Michael Merson，上海市金融工委副书记、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复旦大学金砖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等五位知名人士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们分别就世界经济的走势与发展、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机遇与挑战、金砖国家兴起与世界政治经济新动向等各自研究的领域进行了深入阐释，赢得了全场听众的高度评价。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了大会主旨演讲。

上海论坛（2013）于25日至27

日在上海举行。论坛下设10个分论坛，分别聚焦：“增长奇迹之后的亚洲：困境、挑战与选择”、“没有安全资产世界经济靠什么复苏”、“新形势下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路径和政策”、“亚洲智慧：化解纷争之道”、“亚洲法律智慧的多元性与统一化”、“以亚洲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创新驱动和亚洲城市发展”、“如何保障亚洲四十亿人的健康”、“崛起的亚洲可再生能源：从新技术、新产业走向新市场”、“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人类关注的焦点”十个分论坛，以及“揭开全球安全资产缺失之谜”。

此外，作为每年论坛最受关注的部分之一，今年上海论坛的高端圆桌

会议继续聚焦一系列具有前沿性、挑战性和交锋性的话题。“揭开全球安全资产缺失之谜”、“智库对话：新机遇、新领导、新责任、新政策”、“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圆桌会议”、“可持续公私伙伴关系：亚洲公共治理的新契机与新挑战”等四场高端圆桌会议上，与会的政、商、学界代表分别从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出发，就以上话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思辨。在为期三天的会议和研讨中，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名代表围绕亚洲和全球合作发展中的众多热点议题展开广泛、多维、深刻的研讨。上海论坛（2013）于 27 日闭幕之时发表一年一度的“上海论坛共识”。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国际经济论坛，发起于 2005 年。本届论坛为上海论坛的第八届年会。八年来，共有海内外政、商、学界精英人士约 3000 人次出席。论坛始终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通过年会搭建“学界、政界、商界”三方交流互动的平台，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提出发展建议和决策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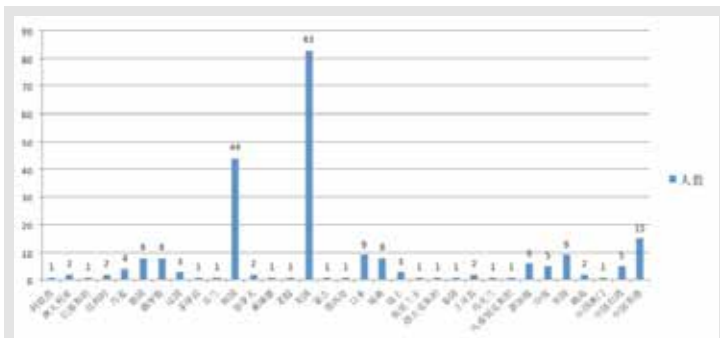
上海论坛（2013）总结会



2013年6月21日，上海论坛（2013）总结会在光华东主楼701会议室召开。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部分专家委员会成员、分论坛主席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长、复旦大学校长外事顾问陈寅章主持。会上，上海论坛常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张怡副教授从会议组织、与会代表、学术产品、媒体报道和创新亮点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本届上海论坛的组织运行情况，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萧思健详细介绍了上海论坛媒体宣传情况。林校长对于本届上海论坛的组织做出了高度评价，对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分论坛的组织者表示感谢，并就上海论坛的发展，鼓励大家“精诚合作，继续坚持、拓展、深化，把上海论坛发展成复旦的资源 and 品牌。”

本届上海论坛共分为经济金融、政治法律、城市社会、环境能源等4大模块，设立了10个分论坛、5场圆桌会议和2场会前圆桌。与往年相比，新增了公共健康、气候与环境等领域以及金融、智库和金融家俱乐部等特色圆桌，提升了学术覆盖面和影响力。本届论坛共举办了60余场专题讨论会，共计380多人次发言，论坛与会人员来自34个国家或地区，总数达678人。论坛学术产品种类更加丰富，编辑出版了分论坛研究报告、《危机后的调整与再生》亚洲研究报告、《上海论坛论文与演讲精选集》两卷、《分论坛观点集萃》，及《亚洲道路——上海论坛2012嘉宾访谈录》等学术产品，加强了对论坛思想成果的深化和提炼。



上海论坛（2013）邀请到来自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共678人



上海论坛（2013）媒体报道数与往年相比有显著提升



论坛特设“学术产品展示区”，推广多元化的学术产品

第九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2013年7月31日-8月1日，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延安大学协办的第九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延安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亚洲研究的下一个十年”，共有来自全国11所亚洲研究中心，北京论坛、上海论坛秘书处，延安大学，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五十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伊志宏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亚洲研究中心理事长陈雨露，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延安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杨学义、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显章、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延边大学副校长崔炯谟、延安大学副校长张威虎等出席了开幕式。

主旨报告阶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亚洲研究中心理事杜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黄大慧分别作了题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和《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影响》的报告。

在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圆桌会议上，围绕各中心工作的成就与特色、各中心未来发展方向及预期目标，特别是在下一个十年各中心如何加强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亚洲研究的学术创新等议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代表和北京论坛、上海论坛的代表分别作了报告。大会在热烈并庄重的气氛中闭幕。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作了总结发言，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各中心的工作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的中国11家亚洲研究中心、北京论坛、上海论坛负责人参加的年度工作会议，旨在加强各亚洲研究中心相互之间的联系，为各中心的交流与合作搭建良好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这11家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已经渗入亚洲事务的各个方面，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开幕式大会致辞



■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参加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复旦大学共同举办的上海论坛（2013）。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复旦大学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来宾和专家以及新老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教育部上海市领导对我们始终如一的关心表示敬意，向韩国 SK 集团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 2005 年以来上海论坛已经成功地举行了七届，本次是第八届。上海论坛汇集政商学界的精英，围绕中国、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热点问题，开展深入的讨论，提供互惠共赢的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为决策者提供各种有效的建议。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均在相关的问题上有持续不断的研究和思考，有各自的经验，所以使得这次论坛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使得上海论坛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论坛。今年我们第一次选择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来举办论坛，在我们的旁边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黄浦江见证了上海在中国工业化、经济发展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见证了上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跳跃的潮头，我们在这里举办论坛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条江和上海这座



城市的历史，提醒我们随着时代的不断变革，人类需要有足够的智慧，以总结过去的经验，同时来讨论当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可能的答案，复旦大学历来也应该成为这样的智慧的提供者。因此我们将今年的论坛主题定为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当然和谐是一个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词汇，而在今天它正在日益被世界的各种文明所接受，如何阐释和谐，并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当中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发展，可能是人类社会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我们的必然选择。我们希望通过强调智慧来抵御危机，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总结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的发展、经济的的增长的确是十分重要。但简单的禁锢主义并不足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与我们在增进物质文明时的努力程度相比，人类在营造一个宽容、和谐与互信的世界方面，和谐的程度显然小的可能，我们应该思考究竟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提出这一主题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世界的主要发达的经济体不断面临着金融危机的挑战之时，亚洲国家能否独善其身，保持其稳定的发展。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否经得起考验，我们是否为迎接未来的可能挑战做好了准备。亚洲能否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或者说亚洲应该如何独立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够为世界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基于学者的学识以及政界、商界精英们的经验来开展理智、深入和谨慎的讨论。

各位我们期望在上海所达成的共识，将成为我们未来

全球世界的现实。为了亚洲智慧这个主题词，本次论坛将分别就增长奇迹之后的亚洲，没有完全资产世界经济靠什么复苏，新形势下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化解纷争之道，亚洲智慧的多元性与统一化，全球治理问题，创新驱动和亚洲城市发展，如何保障亚洲实施以人的健康，崛起的亚洲，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等十大重要议题，开展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在这次的论坛当中，首次提出了亚洲公共卫生健康的议题，今后我们将更加关注与亚洲人民的民生、福祉相关的议题，以强调论坛对人的关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求同存异，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全人类的福祉是共同的，但实现福祉的道路可能有所不同，对此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做殊途同归，就是同样的目的但是实现的路径可以不同。对此我们相信在充分尊重彼此立场和差异的基础上，在理性、开放和自由探讨与对话当中，各国的各界人士一定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和学识，并将其凝结成为亚洲和世界的智慧，寻找到和平共存、合作共赢、成果共享的和谐发展之道。最后祝愿各位嘉宾在上海与会期间度过美好的时光，留下愉快的回忆。更希望各位嘉宾爱上上海，爱上复旦，爱上中国，在论坛结束之后能够常到中国来看看，常到复旦来看看，让复旦有机会倾听世界前沿的声音，也让世界看到中国上海乃至复旦的发展与进步。谢谢大家。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 **崔泰源 (朴仁国代为发言)**
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感谢复旦大学组织这次非常有声望的国际性的盛会。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所以你看我们也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学者来自于政府和学界的人士共聚一堂，分享彼此的见解。市场和资本的介入也是越来越广泛，然而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这样的问题，就是真正的商业价值它到底是位于新兴经济体还是说它位于其他的一些外延，很大的发展是否仅仅是因为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呢。另外我们对于一些投资资金，包括创新的推动以及人力资源的发展，人才的集聚等等，我认为这些因素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考量，但是目前他们在全球的分布还没有达到完全公允的情况。最近的经济危机是全球化负面作用的一个例子，所以因为全球发展的不均衡，可能进一步导致了当前的危机，所以我也敦促每一个人都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均衡度的重要性。并且来去接受这个亚洲时代背后所催生的重要的使命，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打造一个可持续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所以最终我们希望能够为全球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获得繁荣的发展。特别是之前因为全球化而没有获得好处的那些人，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分享一杯羹。亚洲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没有其他的区域那么大。所以我们有必要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东亚整个区域的特征，所以考虑到在过去我们可能缺陷足够的经验或者说意愿来去推动区域的整合，所以现在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最近亚洲的各个国家其实在区域性的一些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例如对于区域性的一些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人们对于彼此合作表达了非常大的热情，我们当然有青睐创意，包括其他的

类似于金融的创意，所以我希望上海论坛将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给我们带来点石成金的效果，更好地帮助我们去找那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解决方案。

所以作为这样一个努力的一部分，SK集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作出承诺，并且毫无保留地来去支持上海论坛。所以通过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合作，通过和复旦大学的合作，进一步地推动上海论坛的推进。另外我们也希望总是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能够缩短或者说缩窄这样一个发展的鸿沟，现在SK集团在韩国以及全国各地也大力地推动社会型企业的社会发展，同时也希望能够和国际组织展开合作，希望更好地打造社会性企业生态系统。在去年的上海论坛过程中我们组织了一个子论坛，主题叫做“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可持续性的管理”，那个子论坛主要关注社会企业责任，我们也感到非常自豪。在未来作出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将会继续感到非常自豪。SK集团将会再接再厉，希望采取大力的举措，应对面临国际社会的一些挑战。我们希望不断的去找到一些方案，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不要进一步地伤害我们的环境。我们希望能够为全人类谋求非常好的福祉，来应对目前的环境挑战我认为最可行的方案就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了，所以SK集团现在希望推动这个技术领域的发展。我们必须确定一个合适的发展路径，我们必须实现普适性的繁荣和可持续的进展，如果能够彼此携手合作的话，那我们将会能够战胜我们面前的一些困难。并且全球走向繁荣发展。

谢谢。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 翁铁慧

上海市副市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5月的上海春意盎然，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今天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上海论坛在这里拉开了帷幕。首先我谨代表上海市政府对论坛的开幕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高校是天然的思想库，是提供创新思想和建设性的公共政策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复旦大学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等各方支持下，打造的上海论坛从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年会，并已成为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坛之一。多年来论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坚持立足上海，聚焦中国，关注亚洲，放眼世界，聚焦金融与贸易、政治与国际关系、城市发展、生态环境等热点问题。汇聚来自全球的政、商、学各界精英。深入研讨谋求共识，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论坛已经成为凝聚共识的平台，决策咨询的平台，增进友谊的平台。今年的论坛选择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为主题，这在当前纷纭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可谓是切中要害。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近几十年来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正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强支持者之一。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更是在持续寻求通过建设自由贸易区等措施，以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化来促进改革、促进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缺失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在经济、金融、贸易和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的制度安排不足以持续支撑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世界，如何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各类文明传统智慧中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之道。因此我们迫切期

待本届论坛能够提供大量的建设性思想与观点。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李克强总理日前在上海调研时指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地增长，防范通货膨胀，控制潜在的各种风险。又要聚焦于稳中求进，在稳住量的同时，尽力实现质的提升。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上海将坚持不懈地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努力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发展的新动力。着力打造助梦、追梦和圆梦的机遇之城、繁荣之城，努力当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拓展改革思路，形成改革举措，推进成果获利。因此我们十分期待本届论坛能够为上海的改革发展提供创造性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女士们、先生们在本届论坛即将揭开帷幕之际，让我们共同期待观点的交融、智慧的碰撞，为世界美好的明天作出共同的努力，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 Robert Zoellick

第十一任世界银行集团总裁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美双边关系全景展望

尊敬的朴主席，非常感谢您所作的介绍，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周到安排。能够受我的好朋友——复旦教授吴心伯之邀参加此次盛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和吴教授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美两国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方面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的介绍而认识。我也很高兴地看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为此次论坛提供了资金资助，帮助论坛更好地实现此次盛会的宗旨——加强区域建设和合作。

去年习近平主席到访美国的时候，提出了“大国关系新类型”的概念。作为回应，今年三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提出，想要在传统力量和新兴力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我想习主席的概念可能是源自于对于历史上的强有力领导力量的研究。在去年中美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中，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说：“我们要证明，大国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主流大国之间发展合作关系的新渠道。美国哈佛大学的格雷汉·埃里森和约瑟夫·耶把这一挑战比作“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来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

尼萨战争，指雅典力量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力量转变对竞争局势的影响。有的力量转变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有的则会引发冲突。

今天，我将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概念的基础上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将是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我的朋友罗德，澳大利亚前首相和外交部长，也曾在一系列引人深思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为中美关系规划了一个新的战略路线图，相信双方应该不断地加强战略合作以及对话。我希望能够再补充一些具体的政策，以推进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这些政策将主要聚焦在经济、安全问题以及一些中美双方需要解决的障碍等方面。

在2005年时，我就提出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内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崛起提供了支持。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开放可以在贸易、投资、科技、增长以及安全等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邓小平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20世纪末的国际关系体系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保持并扩展整体利益，适应新的挑战都需要被考虑紧大国利益中去。然而如果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能认同一个基本的国际体系原

则，这些国家将无法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表现的更像一个不情愿的利益相关国。许多人关心中国是否对这个定位有争议或者能否适应这个角色，或者像中国的一些声音所提到的，中国是否希望新体系的到来。如果是，那么这个体系会是什么样的呢？中国是否会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带入国际关系中等等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引出了另外一个疑问：中国对于现有国际体系的批评是否考虑到了中国达成目标的成本以及其他国家对此的反应。这些问题首先在亚太地区被提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在考虑可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于中美是否有系统性的共同利益以及特定政策严肃而深入的交换意见。

中国的经济成长令人震惊，在过去的30年中，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平均10%。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外资直接投资目的地。而美国的GDP总量仍然占全球的22%，尽管随着发达经济体占据技术前沿，生产力的提高更加困难，美国近期在能源、软件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还是展现了一个发达经济体的不同寻常的适应和复兴的能力。不同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甚至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美国人口出生率是很乐观的。美国与其他北美伙伴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同样展现了很好的前景。

然而全球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上升，以及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使得中美两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必须做出更多改变。去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部委同世界银行合作共同推出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很好的描述了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研究人员尝试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中国同事明智的指出从历史角度看，直线型的发展计划是不可行的。世行回顾了101个在20世纪60年代属于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并发现截止2008年，其中只有13个成功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希腊。

中国过去非常依赖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所以中国也必须适应全球结构的变化。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出口的一半，并贡献了过去5年中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中国不能再依靠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来实现增长。中国需要改变发展模式，更多的依靠内需并加强私人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增加，鼓励创新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变化将使得更多的中国人从他们数十年的勤劳中获利，消费的增加也将社会压力显著下降。《2030年的中国》还规

划出一条通往新的增长模式的路径，包括完成土地、劳动力、企业以及金融的转型；开放创新系统使得中国能够移动到价值链的上端；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重建财政系统以使各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能够匹配；净化环境并为稀缺资源定价；考虑中国结构调整的国际影响等。

我并不期望中国的新任领导人能够上演“大爆炸”式的改革，但我的确认为他们和省级领导将会进行实用性的实验。李克强总理已经指出，通过城镇化，中国可以将土地、劳动力、企业、教育以及其他服务如消费、生活标准、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可持续性、金融、政府管理等诸多议题联系起来。甚至认识到需求的改变也是一个重大的前进。二十年前我们也看到了日本政治的抵抗，不愿意去做一些新的改革。而现在的首相安倍正在采取大胆的举措而进行新的改革。然而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将会很难，中国领导人将会需要保持增长的平衡并同时改变未来的增长结构。“新型大国关系”期待着经济上甚至是体制上的改革。中美双方应发现共同利益，支持结构性改革，实现两国的经济再平衡。

我们还要去考虑更多的经济方面合作，比如说去增加生产率，创建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更多的企业家创新的机会，并且不断扩大内需，中国必须在自己的服务行业开放竞争，中国的私人部门应该扩展其作用。除此以外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外国企业可以把更多的技术和资金带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拓宽自己的服务行业。这样一种合作可以减轻贸易不平衡和摩擦，并且把合作做得更好。中国也必须把教育、技术、风投、网络以及知识产权都放到创新日程上去进行发展。而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参与也可以更好地去帮助美国本身的发展。另外我们必须要有更强劲的、更灵活的安全保护系统确保中国的服务行业能够发展得更好。在美国也能够更好地去解决金融方面的内容，可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护网络。另外中国的食品需求和水资源的保护也可以得到美国产品、技术、体制的支持。更开放的市场可以拓展环太平洋农业合作同时提高生活标准。

我们还有在能源和环保方面有很多的双边合作机会，其中包括一些资源分配，还有对水的净化以及空气质量的改进，土地使用的改善等等。所有的这些工作也必须让我们用更好、更灵活的市场机制进行支持，同时保证安全有效的管理。中国需要这样一种改变：从一个有着许多最小收益的储蓄者的国家，变成一个有着许多在私人部门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投资者的国家。中美以及其他国家都需要更好的框架去鼓励投资同时管理国家安全和和其他敏感性

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 21 世纪的领导人可以参考邓小平和朱镕基建立起来的框架，利用市场、规则、竞争、机会和国际经济标准去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进步服务。美国同样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特别是在养老和健康保健系统、税收改革、基础设施公共与私人伙伴关系、技术和职业性教育等领域。美国福利项目现在每年人均花费是 7,400 美元，这超过了中国的人均收入。中美两国都有很好的理由去推进结构性改革。当然在未来通过我们的携手，也希望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些改革取得的成就也会有助于全球经济状况的提升。

我感觉中美的经济方面的对话，不管是通过战略上的还有商业上的，还有通过 20 国峰会的，WTO、APEC 这样的组织方式，总是能够带来很大的成效的。另外中国的不断增长以及美国的经济不断恢复，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机会，双边都必须要去探索这样的双赢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点子都可以成为事实，这样一种新型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很开放的创新和解决方案。另外这两大全球的强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美国和中国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合作方法和可能性。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创造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系统。比如说中国的很多服务系统开发可以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和 WTO 之间的关系，WTO 的信息技术也已经在 1999 年签订了。这也对全球的外包和物流供应链系统创新以及消费者都带来了很多好处，现在 WTO 也在考虑自己的 ITA-2 的工具，使它能够更好地去促进服务业。中国和美国也在这个方面必须要做更多的努力，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机会，比如说安全、食品、贸易、政府的采购等等。另外我们有更多的压力，必须要去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管调，在过去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归条的签订，鼓励国有企业的操作更加规范化和合规性。在美国和中国双边我们也必须要考虑未来的财政货币系统，这个系统也必须调整，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来做进一步调整，这样一来可以促成更有效的全球的财务货币系统。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中国逐渐开放资本账户，大国关系的新时代需要主要经济体更多的去调整、适应改革带来的变化。

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很好的关于发展的经验和观点，不管是原材料、农业、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投资行业的发展。中美双方在经济增长，有效管理，透明度，反腐败，法制、贸易，控制经济周期等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双边或者多

边的机构来强劲双边的关系。另外还要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包括野生动物的保护以及低碳社会的建立等等。如果说中美双方出现了一些争议，我们双边一定要去做很多的讨论，而且国际的系统，一旦双边沟通不好就很难运行，如果说中美之间能合作，那么其他的国家都会参与进来，并且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必须很好地去做好这样的一些工作。

但是中美目前缺少一个处理安全问题的组织架构，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我认为这与两国的体制差异是相关的。在中国，解放军向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报告，该组织中只有一到两个非共产党党员。我也发现中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甚至是国务委员级别的也只是在自己的军队行动了之后才有能力进行干预，有时甚至已经对中国的外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外交方面和军事方面以及经济、环境保护方面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

另外我们有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双边必须要关注的。我们中国和美国之间有着军事方面的一些交流，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水平和层次。我们也经常在考虑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更进一步地深化双边的信任。我们也有更多的安全方面的关系，这方面我们要做更多的考量，特别是关于军事方面的关系。中国有很多学者，也已经考虑到必须有这个需求来强化，深入地讨论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话题。我们也必须更多的去做这方面的外交和安全以及国际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国军方还有政府的官员，还有党员都要去做这方面的讨论。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的关系可以给到我们一个补充的新的战略性的对话机制，目前这个对话展开在很多的话题上，但是我们的频率性还是不够，而且层次也不够高。所以说我们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做广泛的讨论做出一些战略性的决策。

我们也参与过这样的一些对话，而且参与了很多的对话来考虑全球的观点和利益，目前的概念、框架。我们还需要有更高层次的一些对话，其中包括军事方面的对话，并且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从地理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战略的角度，技术的角度，以及政治限制的角度，还有国家的利益角度以及寻找双边利益的角度来进行，并且它也会帮助中国和美国更好地去处理彼此的不同点。在这样的对话当中，美国也应该提供非常明确的解释。美国的政治并不是像中国想的那样在一个限制的基础上去进行的，另外美国的一些政策也可以解释中国的一些行为。

最重要的是中美双边是有非常强劲的共同利益，而这

一点就是双方必须要深入共同发展的。包括海事方面的安全，这对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自己周边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中国的亚太区域能够起到安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要更好处理交通、物流、信息流、人员流，另外也要调整能源的价格，其中开发更好地节省使用新资源。我们也在海外地区要更好地运用资源，包括油的资源，并且进行技术的更好开发。其他资源的开发要联合我们的社会，包括环境的措施，综合地来管理不同的区域，它的资源所属权的争端。包括要为其他的合作伙伴也能够带来安全感，这样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稳定化，而避免潜在的军事化的冲突和争执。当然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特别如此，包括一些区域性和全球的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来维护我们全球的和平。包括打击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我们希望你鼓励伊斯兰的事件能够以和平的角度来展开相关的磋商，所以上面都是一些重要的利益点。我们这边也需要能够去分析一下，对以上的这些共同的利益有哪些潜在的威胁因素，采取对应措施来应对这些威胁因素。

然而，如果无法很好地解决亚太地区的争议，这些共同利益甚至是经济的互相依赖都微不足道。所以对于中美以及领导层的挑战，就是如何以全球化的合作来降低区域的摩擦、冲突，而不是让这个区域性的冲突伤害到全球的合作，中国当然在我们的沿海岸也是有一些安全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对话。除此之外在联合国的大框架下我们一直在讲到相关经济的安全和其他联盟等等。美国一直在强调这些联盟的重要性，通过大的框架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安全，中国和其邻国包括和日本的关系，不能够被孤立于中美关系或者美国和其盟友关系之外来独立考量。同时，美国的伙伴国家也十分重视他们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领域与中国的联系。

如今中国在亚洲的伙伴数量有限，而且较为贫穷，并不可靠。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数量与日俱增，如果中国的影响力被错误的解读成被其他国家有一些相关的威胁的话，中国自己也会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所以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必要和美国的盟国来建设一个纽带和关系，而不是说让他们的盟国感到更加威胁。所以中美能够联手更好地在全球化的体系下培育一个区域化的很好的合作体系。除此以外我们也关注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意识到在我们的安全框架之内进行经济的发展和与合作。当然如何去进行更好的资源分配，包括海事安全的保障等等，所以你看东南亚国家也意识到一体化的重要性。所以任何的国家不应该



卷入冲突，我们应该通过合作的方式，更好地分享彼此的利益。东北亚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朝鲜的经济确实是处于崩溃的情况，除此之外朝鲜可能也是有一些核试验的威胁，所以通过他们的举措，也给这个区域带来不安全的元素。包括其他的一些国际贸易，以及非法的走私、武器的走私活动等等，也构成了一些威胁。对于我们这样的相关核裁军的协议，其实朝鲜也是有所拒绝。可能会对人民有一些伤害。朝鲜对于韩国包括美国也是有先发制人的威胁，日本也感到了受到朝鲜的威胁。所以朝鲜现在在进行弹道导弹包括一些核武器的实验。

传统角度来看，中国认为朝鲜是一个安全的缓冲区。但这个逻辑已经过时了，侵犯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由朝鲜引起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加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之前戴秉国先生和我在 2005、2006 年展开一些安全的对话，当时我提议如果朝鲜能够像中国一样发展，那美国会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如果朝鲜半岛能够实现统一，美韩同盟也会使得朝鲜半岛消除疑虑，毕竟朝鲜半岛是有着成为相邻大国的军事基地的历史的。如果统一的朝鲜半岛继承了核武器，那么日本就会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无核国家，这会使得日本非常担忧。而且，我也同戴秉国先生讲过，从我的角度看，美韩同盟是由南部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来维系的，而不是一些中国方面所猜想的鸭绿江的陆军。相反另外如果美韩盟友关系结束，日本可能就是在在这个区域唯一的美国的盟国了，这会使得日本比较担忧。

那是多年前，如今中美的战略制定者需就东北亚的安全形势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猜想之所以中国在敦促朝鲜去结束其敌意的一些行动，包括开始改革有一定的犹豫，是因为担心无法控制其改革的进程。包括美国以及其在这个区域的一些盟友，可能也对它潜在的影响非常关注。所以中国这边确实有一些压力，现实就是如果威胁这样的一个朝鲜，敦促朝鲜来采取相关的变革措施，可能会对中国对于地区的安全地位有所调整，或者说影响。所以这些关

系是非常错综复杂，但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能够进一步地采取措施，避免双方的信任缺失。

然而除非中美能够减少网络安全带来的不信任，所有“新型大国关系”实质性的提案都不会有结果。网络安全它可能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安全形态，有时候可能在网络空间也会有一些冲突，包括间谍以及商业间谍的活动。美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相信，这种商业间谍的活动是无处不在，比较泛滥的。包括蓄意破坏，以及网络的一些战争。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基于虚拟的空间，发起的一些战争，有时候它可能会有附属的伤害，包括大面积的损伤。随着核武器的到来，人们也非常关注一些安全策略的制定，更好地来管理这些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那对于网络的安全，目前它和传统形态的安全是有所不同，所以现在在 21 世纪我们必须能够关注到这种新型的安全威胁，否则我相信习主席他的一些建议未必能得到很好的履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去关注到网络安全，更好地把习主席的愿景加以兑现。

美国内部有这样一个讨论，关于中国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是否能够接受一个能够更好地推动整合的，基于原则和规则的体系。包括基辛格也认为，中国把自己视作是中心国家，只接受附属关系。这种观点上的分歧部分的体现在不同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经济政策制定者们观察到邓小平可能关注到全球的改革开放的角度，之后朱镕基总理进一步去推动中国加入 WTO，更好地融入国际的关系包括规则。中国在最近五年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态度，我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也确实目睹了中国的一个积极的态度，也非常支持多边的合作机制的打造，所以中国在应对全球危机的过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安全威胁是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主题，所以中国在 21 世纪对于国际关系它的概念也在不

断地演进。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未必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去应对一些挑战，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些机会去做一些探讨。不仅中国为这个关系的建立带来很多历史问题，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也并不愿意维持现状。有些评论家会问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似乎不愿意去维持现有的秩序呢，一个美国全球策略的象征是一美元纸币。在它的背面，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印章，这个印章是在 1782 年由美国国会来批准的，里面有一句维京人的格言：新时代的秩序。正如我的一名外交历史的教授在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美国历史其实都是关于一种新秩序是否局限于初创的美国还是能够有更广阔的应用。除了安全、能源、自由贸易以及金元外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也会寻求提升那些在美国革命中体现出来的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原则。今天，这些原则不仅在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讨论中得以反映，在中国感兴趣的讨论中，包括良好的管理，政府行为的控制和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构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是非常有趣的，它包括了比一个新权力平衡更多的内容。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但是被许多传统的价值观所束缚。美国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国家，但在寻求转型和变革。目前这两个国家都是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和他们各自的区域其他的国家也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他们相关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全球的态势。

我希望今天我在上海论坛提出的一些想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甚至成为在 6 月份我们两国的元首对话的一个议题。这将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我热切期盼听到你们的观点。非常感谢。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 **方星海**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尊 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欢迎到上海来。我今天的讲话题目是跟刚才介绍的稍微有一点改动，但是内容差不多。我这个讲话的题目叫《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世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应该说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变的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并没有因为国际性危机而缓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感到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讲到中国你把它放到国际视野下，我们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只是专注中国的问题的话，那可以说两天两夜、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最近我们经济当中就有一些增速下滑的各种各样表现。比如说1~4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多年来首次同比下滑。5月份中国的汇丰刚刚公布的中国的制造业指数，首次也是下降。

我最近借调到北京去工作了，到北京工作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很担心的就是北京的空气污染，好像在座的好多外国来的朋友，如果去北京去的话，特别是冬天去，大家会有同样的担心。还有中国的其他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比如说因为最近的报道，环保上也有一些大的项目要设立，当地会有一些游行、反对的情况。这么大的国家总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中国如果说我们专注机会，专注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能够做的，而且其他国家不容易做，或者不能做的事情，可以发现也非常多。所以今天我就想在这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机会这样一个题目下，专门谈一些当前中国能够做，但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太容易做好的，或者根本不能做的一些事情。共八点：前面四件事情是跟中国的开放有关的：

第一，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对外开放非常有利的位上。几乎在所有的行业，大家可以分一分各种各样的行业，比如说汽车、化工、电梯、还有这种像金融服务等等的，就是从增量市场上来看，所有这些行业中国现在在全球基本上都是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它的结果就是说任何一个大型的跨国企业，无论你是在制造业领域还是在服务业领域，它都不能放弃中国的市场，如果说它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输掉的话，很难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这样的一种有利地位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到中国的市场来，它到中国市场上来，它要在中国的市场上获胜，必须把它新的技术、新的研发力量、制造业的最好的技术放到中国来。否则它很难在中国的市场上获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若干年前可能二流的技术在中国也会获得很好的市场，现在很难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通用汽车 GM，大家知道通用汽车最高档的车我也在美国念书、工作，大家知道凯迪拉克，那时候也不见得多好，是美国的年轻人很喜欢的车，当时是日本车更受欢迎。凯迪拉克在中国的高端车市场上跟奔驰竞争，跟 BMW、保时捷竞争，它就必须把它最新的研发技术都放到上海来，它的总部在上海，现在它的生产也在上海。这样它可以非常迅速地对本地的需求作出反应，设计出更适合本地市场的汽车，生产出成本更低在中国市场上竞争的汽车。那么我相信这样的趋势在其他的一些行业也会发生。这就是中国的很大优势，就是说我们也许国内的有些企业研发还上不来，但是可以通过对外开放，通过国内最大市场的强有力的竞争环境，促使技术领先的国外企业把最新的技术放到中国来。这样的例子我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不一列举。

第二，中国能做，其他的国家不太容易做好的。中国现在的企业到海外去参与收购兼并包括跟其他企业做合资，我们都有很多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有不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有的，这个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大，这就使得很多国外的企业因为中国的市场大，所以它愿意被中国的企业兼并，或者跟中国的企业形成一个很好的战略合作。然后在中国的市场上获得比较大的份额，利用中国的市场份额赚的钱反馈它在全球的竞争，有助于它在全球的竞争。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沃尔沃被吉利兼并，大家知道吉利是中国比较小的汽车公司，那么沃尔沃为什么愿意被它兼并呢？我想就是因为吉利是一家中国的汽车公司，兼并以后沃尔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可能获得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在中国赚的钱有助于沃尔沃在全球跟 BMW 竞争。如果吉利不是中国的汽车公司，而是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公司，大家试想一下沃尔沃会不会卖给吉利，我相信是不会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的资本市场本身不是很发达，但是我们的资金实力非常强，我们的收购兼并在海外做的已经得到国内的银行，我们的资本市场在资金量上强有力的支持，不敢说在服务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也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

还有一个优势中国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发了一些适合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适用的技术，所以他们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去收购兼并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技术很适合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结果很有助于他们在海外获得收购兼并的胜利。例如国家电网的例子，国家电网公司这五六年来在世界上做了十几桩应该说也是规模比较大的收购兼并，在菲律宾、澳大利亚、葡萄牙、巴西等，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技术非常适合用这些，特别是像菲律宾、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第三，中国现在的服务业，金融服务、教育、医疗卫生还有一些消费通讯方面的服务，这个行业服务业中国市场现在机会非常好，而且特别大。如果说我们对外开放的话，相信国外最好的服务业的企业都会到中国来。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谈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叫中等收入的阶段，服务业方面的需求成长速度非常快，如果说我们抓住机会，在服务业方面有更大的开放，相信我们会吸引全世界非常好的服务业公司到中国来开展业务。迅速提高我国服务业的质量。服务业质量的提升跟制造业不太一样，制造业你引进一些设备，聘请几个设计人员，生产质量就提升了，服务业必须要引进已经有成熟的运作经验的企业进来才可以，不是说找几个人就可以。

第四，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能做的，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一项我本人非常关注的工作。刚才 Robert Zoellick 先生也谈到了，中国可以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的形成过程。谈到货币的国际化，我相信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愿意，也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愿意让他们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我感到

只有人民币现在是一个潜在的国际货币。别的国家的货币你说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它成得了吗？日元曾经试过，没有成功。俄国卢布它也愿意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但是它成功了吗？如果说我们国内大家有进一步的共识，我们着力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是非常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十年左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至少是贸易货币，今后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货币，最后是一个储备货币。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国内来看我也提到过，想提四个我们国家能做，别的国家不太能做的事：

一、我们中央政府可以发行长期的，相当多数量的长期债券。比如说三十年的国债，我们可以发很多。到去年年底中国国债占 GDP 的比例大概是在 14% 左右，这在全球是非常低的。不是所有的国家想发国债都能够发得出去的，欧洲很多国家现在想发也发不出去，中国发长期国债的潜力是非常大。而且我们的长期国债绝大部分都会被国内的投资者所抢购，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储蓄，不需要外国的投资者来买我们的国债。这些长期国债如果发出去的话，它有非常好的功用，短期之内它可以迅速地促使国内需求的上升，因为这些国债收集来的资金可以用于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本来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我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让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教育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投资。这是对短期的宏观需求的作用。

对金融市场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储蓄很多，但是可投资的品种非常少，如果说这些长期的国债发出来，利率有 5% 以上的收益的话，相信很多普通老百姓都愿意投资，风险没有了。这样对完善整个金融市场的体系，对减少金融风险也非常有帮助，现在很多钱投在影子银行各种各样不规范的理财产品上，这些状况都可以改变。

二、如果说我们这个简单化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有所改变的话，在中国它产生的效益是非常高的。中国跟很多国家有点不一样，这也许是要归功于我们的老祖宗的多年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对孩子、对家庭的观念是非常强的。特别是中国的很多比较高收入的人群，或者说中高收入的人群，不像其他国家收入高了，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中国不一样。我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我有一个同事非常能干，三十岁多一点，已经提升到上交所的部门总监了，一个女同事。她为了生第二个孩子，就辞职了，待在家里面。你看这个造成多大的人力资源损失，如果说我们的政策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计划生育中国是要的，不是不要，如果不是简单的这种一胎化的政策，我想这个同事她可以不需要辞职，她可以边工作边生第二个孩子，就不必要造成这种损失了。如果我们的出生率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城市里的出生率，内需是马上就会上来的。小孩带来的需求是很强的。加上中国人重视教育，十几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希望这件事我们的高层决策者能够尽快作出恰

当的决策。

三、我们有大量的民间资金急于进入各个不让它们进入的行业进行投资。我老家在温州，我知道温州是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地区，当地有很多中小企业，就是可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创业了，后来积累了一些资金。到后来由于我们太多的原因，不让这些积累的资金进入，结果这些资金只能去干什么？炒房地产，炒大宗商品，搞高利贷，结果造成现在温州很多金融风险。其实他们很愿意进入我们的金融领域，很愿意进入我们的教育、卫生领域，也很愿意进入我们的一些信息服务领域。如果这些领域对他们开放的话，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么多毛病了。如果说他们能够进入这些金融领域的话，对他们自己的一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也会很有帮助，也省得他们在一些不熟悉的领域如太阳能、生物科技等在那边乱投资，结果投资失败。

四、大家谈得最多的，国内做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拔苗助长，是为了城市化而建很多楼。我们把人口政策、户口政策，这阻碍在人口经济发展当中的正常流动的障碍把它去掉，使城市化有了更快的、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推进。这会对我们的内需产生巨大的推动。

以上谈了八点都是现在马上就可以做的，而且是其他国家不太容易做好的。要谈到中国的机会，我们还要再退一步看看中国本质上最强有力的竞争点在哪里。中国跟别的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中国有 13 亿非常勤劳工作的人民，你给他一点工资，甚至不是很高的工资，他都愿意很认真地去干活。这在全世界不容易找到的，我在 Robert Zoellick 当行长的世界银行工作过五年，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也去了非常多的发展中国家，我相信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有中国这么大，而且是大家勤奋工作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中国最最基本的竞争优势。这个优势使得无论中国怎么样，不要说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等，无论怎样中国的出口在全球都会有非常的竞争力。当然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点，当然数据有可能会有虚的地方，但是听说他们折算了一下，1~4 月份中国的出口还是增长了 10% 左右。

二是中国本质上非常有竞争力的优势，中国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到地区县一级，我们的政府是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我们是非常愿意帮助企业发展好的这么一个政府。全球我也走了不少地方，不见得有比中国政府更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政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当然我谈了那么多优势，很多朋友都会问说，中国现在的风险也很大，你这个优势能否发挥出来，你八件想做的事能否做得出来，如果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现在习主席也是教导我们要底线思维，我们要把问题想透，风险想透。我讲这么多优势等等，是不是没有考虑到风险呢？不会的，我是考虑到风险的。

从经济上来说中国现在主要的风险大家也谈了很多，我也同意两个地方，一个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风险，还有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但是我本人感到，这两个地方的风险我们可以很好地加以管理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风险这些贷款或者其他的融资，大家仔细看都有土地或者房产做抵押的，这样一个融资结构你要处理它当中的风险，最关键的就是要以时间换空间。就是说你首先现在新的贷款，新的融资要把它慢下来，不能像前几年那样继续膨胀。然后你不能因为有一家企业贷款还不出去了，你就迫使它破产，不能做这个，你要以时间换空间，或者通过延期等其他的融资办法能够往后推。中国经济在增长 7% 以上，几年以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土地、房产和其他的一些资产都会有值钱的。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是 1998 年在建设银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与信贷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当时的情况比现在还遭，不良资产比率是 30% 多，我们采用的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到 2003、2003 年的时候，这些原来看上去不值钱的资产后来都值钱了。所以这是中国处理危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经济在增长当中处理危机。而且中国处理危机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处理危机的时候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缓冲，别个国家没有。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些风险，你把它想透，想出处理办法的话，会发现中国是有办法处理的。我们的关键不能停下来只是去处理风险，然后不抓发展，那就完蛋了，那就有问题了。我们要继续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理这些风险是可以的。

我刚才谈的八点当中，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这里面有很多东西牵扯到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下一步能否推进，很多人也会有疑问。我本人对这一点是有充分的信心，我已经谈到了中国的政府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工作的政府，现在经济增速在下滑，这就必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改革步伐。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了，改革开放会加速，所以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因素担心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既得利益等某种因素，会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会缓慢下来。

总结一下，中国这个国家问题很多，但是我们机会更多。只要我们把风险想透，把处理风险的措施想清楚，做好安排，我们就可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然后在发展中处理这些风险，那我们的经济就会上一个新的很大的台阶。谢谢大家。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 Michael H. Merson

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

杜克大学全球战略与计划办公室副教务长、
副校长、全球健康Wolfgang Joklik教授

40 亿的亚洲人谋求更好的健康水平： 未来十年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战



非常感谢各位尊敬的嘉宾，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40 亿的亚洲人谋求更好的健康水平：未来十年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战。这个题目已经传达了我想表达的主要信息。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始了一场斗争。我将简要地描述这场斗争的场景，并展示我们将如何应对。这将是一场硬仗。

35 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儿，我在路上看到到处都是自行车，人们在打太极，没有麦当劳。现在，随着我们讲到的那场斗争，可以看见亚洲变化的情况。我们能看到，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亚洲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日本、新加坡、韩国居高不下，柬埔寨、孟加拉国排得比较低，但我们知道亚洲发展的速度是最快的。其次，亚洲也是一个飞速城镇化的地区。这张图给大家看到是在 2007 ~ 2025 年 GNP 全球排名前 50 的城市，你可以看到，什么都在向东转移，深绿色的就是大多数城市到 2025 年的 GNP。第三个趋势就是快速的全球化，大家可以看中国在汽车、彩色电视机、计算机方面的使用情况，亚洲正在变得西化。自行车之使用量开始下降，后来上升，这是因为中国后来更多的是把自行车出口到外国的国家，而不是广泛的骑自行车了。第四，工业化。大家可以看到城市的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我们在亚洲确实是比较有高的死亡率。中国 2010 年死于城市空气污染的有一百二十万人。第五就是快速老龄化，在亚洲 65 岁的以上人口的规模与日俱增。到 2050 年 20% 的人口将会是 65 岁以上，8% 的全球人口将会是 80 岁以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

着，快速的经济、城镇化、全球化以及老龄化为我们提供了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战的最佳背景。我们会看到在亚洲地区，人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能够进一步降低母亲在分娩的过程中母亲以及新生儿的死亡率，这在前两年还是引起死亡的原因之一。这里可以看出，有八个不同的亚洲国家在 1990 ~ 2010 年母亲和新生儿死亡率在下降，主要是五岁以下死亡数的下降，这是因为四月传染性疾病的儿童越来越少。

但我也想提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在推动这么一个运动，目的是到 2020 年能够把可预防疾病导致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到零。在亚洲地区，有一些正在出现的传染性疾病，包括登革热、SARS、禽流感、多重耐药性的肺结核，以及疟疾等等。这些疾病不会在大范围内导致死亡，但是一旦爆发，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非典的流行让亚洲损失了 300 亿美元。你们最近刚刚经历过的 H7N9 禽流感，它让亚洲损失了 80 亿美金，特别是对于活禽市场的影响。但这些疾病没有引起很大的死亡，更多是经济上的影响。以上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场战争的背景。那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疾病呢？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疾病是引起全球死亡率的主要原因，非传染性疾病 (NCD)。2010 年世界上 65% 以上的死亡都是由此导致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80% 的疾病以及 90% 的可预防死亡都由非传染性疾病导致。四分之一的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发生在 60 岁以下的人身上，到 2030 年，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疾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将会增加 50%。请你们看这张地图，

它展示的是我们称之为“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数据，这个数据与成年之前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相关。如果颜色越红，那么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遭受非传染性疾病侵扰的程度越高，负担越大。所以确实在亚洲，我们这方面的疾病负担也是比较严重的。再分析一下亚洲一系列不同的国家，从这张图中我们看到的是10个国家，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占总体死亡率的比重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左手边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大概占了50%~6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大概是80%~90%左右。但即使是在所谓的贫穷亚洲国家中，非传染性疾病也是主要的死因。

下面我将主要说三类疾病，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和中风、糖尿病和肿瘤、另一个是精神病。首先我们看一下心血管病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死因。目前80%的心血管的疾病导致的死亡是在低收入国家发生的，它们导致的死亡人数是传染病、孕产妇及围产条件、营养不足三者导致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到2030年，大约230.6万人将会死于心血管疾病，其中主要是由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亚洲在非传染性疾病上的负担。这里横轴是年龄组，纵轴为残疾调整生命年。深黄色部分代表的是心血管疾病，浅黄色是中风。亚洲很特殊的一点是，中风的发病率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具体的原因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这张是糖尿病的残疾调整生命年图标。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患糖尿病的人群越来越年轻了，糖尿病不仅是个大问题，而且是攸关青年人健康的大问题。这边是癌症的情况，粉红色的代表男性，可以看到主要是肺癌，所以对男性主要的癌症适应症是肺癌，然后有一点绿色的是肝炎。女性方面，蓝色部分说明乳腺癌为主要的致死癌症，有些国家有一些粉红色的，那是卵巢癌。以上就是亚洲一些主要的致死的癌症。

好，对于这张图有什么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地方？它显示了非传染性疾病是如何迅速地到来的。图中淡蓝色的是在1990~2000年期间中国的非传染性疾病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疾病数量增长得非常快，并不停地在增长。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它们是吸烟以及饮食。首先讲到吸烟，我想明确的是，烟草是世界上对于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到2030年，将会有一亿八千万人死于吸烟，大概90%左右的都是在低收入的国家。在亚洲国家，图中间是男性吸烟致死的比重，在印尼67%的男性死于吸烟，中国50%，韩国48%，日本38%，等等，这个比重是非常高的，吸烟在女性致死原因中的比重还没有达到那么高。另外一点就是饮食因素，这边给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十年前，也就是90年代中期的数据。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摄入更多的猪肉、牛奶和禽肉，不管男女，在城市或在乡村都是如此，而吃蔬菜的量减少了。

而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引起心脏病和中风的主

要原因，就是高血压。我们在全球一些不同国家做了调研，高血压的发病率比较高背后有什么原因呢？主要与盐的摄入有关。一天的盐摄入量应该是5克，而亚洲国家的盐摄入量是很严重的，这是导致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预防措施呢？有四个领域，那就是烟草、不健康的饮食、缺乏锻炼和过量饮酒。我们需要多维度的措施，我们需要采取控烟的举措，包括降低盐的摄入，并且进一步推动水果、蔬菜的摄入，在城市打造很好的环境，推广步行，我们的社区也需要相关的健康项目。政府每一个机构也都要能够去负责起来，以更好的应对这些问题。我在新加坡工作过很多时间，之前新加坡是烟草泛滥的，现在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禁止所有的香烟的广告，并且定制了新加坡的烟草销售政策，规定在包装袋上有一个鲜明的警示标识，并严格禁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香烟。这对控烟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在美国过去十年内，冠心病发生率下降了36%，中风下降了31%。这是因为，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锻炼和饮食的重要性，吸烟率下降，所以那些很难控制的胆固醇以及高血压的问题得到了控制，同时我们的治疗技术也更加先进。

需要做的另外一点就是要把我们应该把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护理整合进入到现有的医患制度中去。特别在初级护理的层面，包括在社区层次采取一些措施，针对这些非传染性疾病展开一些措施，并且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医保的覆盖范围。我相信今天在论坛的分会场，将会有所讨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展开更多的研究。去年杜克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成立的全球健康研究所正式启动，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去促进全球卫生政策的推动和发展。明年中心也会和昆山市政府和中国的其他一些大学，包括复旦大学在健康相关领域做深入的研究。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在整个战役当中取胜的话，必须发起全球性的运动，亚洲必须要借助世界的力量。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有一个千年发展计划，它包括八个子计划，其中第四、五、六项是和健康有关的，它们是减少儿童死亡率，孕产妇保健，以及对抗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的疾病。现在世界在讨论未来的15年中，我们将设定哪些新目标，我们希望在其中能有关于发展和健康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总结，可以看到在亚洲整个的孕妇以及儿童死亡率已经在下降了，而正在出现的非传染性疾病迄今还是并且将继续对经济造成威胁，最重要的是，亚洲面临着快速扩大的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这给预防和控制带来很大的挑战。亚洲各国政府应当在多个层面进行反应，扩展具有创新性的干预措施，并且出台适当的政策。私人领域也应该成为预防和控制中的主要力量。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 **Robert A. Mund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区和货币联盟

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共同参与这样一个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的演讲主题和其他嘉宾的稍有不同，我使用“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区和货币联盟”这一题目是想强调，货币和贸易这两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全球有很多的自由贸易区，这是个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体系，我也非常支持其发展，我同时相信它与货币联盟有着极大关联。

2001 年的此时，我在 APEC 论坛上做了一个演讲。在某种程度上提及了货币联盟，在当时，APEC 的计划是在其内部建立一个相当大的自由贸易区，而我一直认为如果在每个国家都实行灵活性的汇率，有更多的货币合作，我们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能更上一层楼。

我们常需要回顾一下历史以反思当下和展望未来。因为在国际货币体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曾经，对于法国、美国等国家来说，金银复本位制固定了金银的价格。但是当内战爆发之时，美国放弃了它；普法战争爆发时，法国也放弃了它，后来各国各自转向了金本位或者银本位制。但是金本位呈现了上升态势，许多国家都趋向于金本位了。所以除了中国，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在一战爆发之时都出处于金本位体系下。

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就在一战爆发的前一年，美联储正式建立。（这意义重大因为）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仅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比排名第二至第四的三个经济体总和还要大。当该国建立了中央银行，事实上就随即赋予其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或者至少是否决

他国可能想建立的其他货币体系的能力。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要货币。

在一战期间，英镑实际上逐渐变得不可兑现，美元成为了主要的国际记账单位。战后，美国取得了比英镑更加重要的地位。欧洲又恢复金本位。欧洲先行，世界跟从，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不论各国何时回归金本位，都会引起一次通货紧缩。拿破仑战争后是如此，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是如此。有可能就是它导致了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

萧条之后美国和英国都放弃了金本位，一年之后，美国将金价从一盎司 20 美元出头提高到了 35 美元。这成为了基本框架，或者源价格——1934-1971 年国际上最重要的价格。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了金本位制度的规则。他们设计了一套规则，之后修改成为了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本位制。对于货币当局美元可兑换为黄金，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金本位制，因为这一体系并未将国际价格与固定的金价挂钩。

战时通胀——朝鲜战争以及之后其他战争——使得黄金贬值。美国将近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流失了。1948 年，美国拥有世界 70% 的黄金。到 1971 年，他们只有大约 25%。大多数的黄金流向了欧洲。1971 年，美国明确希望将美元和黄金脱钩，因为他们不愿再卖掉黄金，而希望能保留至少一部分黄金。之后固定的汇率制瓦解了，世界分化为灵活的汇率机制。但是这个灵活的汇率机制运动在当时并没有准备好——它不是一个好的机制。在经济学史上没有人论证，也没有任何论著提及让每个国家都拥有灵活的汇率机制是一项很好的安排。然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第二次修订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和灵活性汇率的管理体制。

下面介绍英镑时代及其如何转入美元时代。在1918和1919年，英国是货币强权的中心，但是在当时，美国已然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了。这是金本位制的运行方式，所有的货币都可兑换为黄金。在左上方你能看到中国。墨西哥已经不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它在银本位体系中。就在战争前夕，伦敦依然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中心。当战争爆发之时，资本流入伦敦。英镑升值了，但是仅维持了数月，人们就意识到英镑已不再是安全港了。又过了几个月，美元成为了最主要的货币。

新建立的中央银行和美联储，改变了货币格局。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这个不断提升的力量。当我想到货币体系的这一变革时，就会用太阳系来作类比。黄金是太阳系的中心，太阳就相当于黄金，是太阳系的中心。但当其中的一个行星变大，甚至超越太阳的时候，最终其他行星和太阳都会围绕这个行星旋转。这差不多已经体现在了美国身上，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它成为了世界的超级主导经济体。

回归黄金本位制是一个错误，这样做的人没有研究好历史。他们本应该知道每次各国回到金本位，就像各国放弃金银一样，他们就会通货膨胀，如果继续金本位，他们又会引发新的通货紧缩。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就是如此。即使它没有建立起金本位，仍是实际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核心。但是金本位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它让美国关税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接着它事实上导致了1974年美元的大幅贬值，创造了美元本位制。而且美元直到1971年都与黄金挂钩，这种可兑换性并不提供给美国人民，美国人在1933年以后便被禁止持有黄金。世界其他国家可以用金本位制，但是美国不行。

当时这一货币体系就是美国挂钩金价，并持续到1971年。其他国家把本国货币与可兑换为黄金的美元挂钩。20世纪30年代，德国燃起战火，二战爆发。1941年，罗斯福总统让财政部长着手准备战后货币秩序和世界货币。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人提出商约计划，并引发了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他们试图设计一个货币体系。理论在好些地方磕磕绊绊，但他们还是保证了足够的正确性，最终得以创建一套沿用至1971年的体系。从未存在过什么世界货币，罗斯福曾提议建立一个世界货币，但是他们并未行动，很有可能是因为1944年是一个总统大选年，而这又不会是个好的政策，因此这个提议被摒弃了。英国人的计划也未实现。

在座的罗伯特·佐利克，是11届世界银行的主席。世界银行是1974年建立的世界性银行之一。在华盛顿山饭店，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地方，他们建立了，或者说批准了转化为美元本位制的全球货币体系。在会议结束之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总结致辞中提到这是对货币民族主义的终结。但是这一体系通过三个阶段被打破：黄金是最首要的，

因为价格上升而贬值。它被等值估价，合理估价，然后贬值。没有机制制止其发生，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由于浮动的汇率是一种回到货币民族主义的途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货币和通货膨胀率。因此该体系中的缺陷在于——我真的不想说的太具体——在一个短时期，我们回到了1971年与美国挂钩的固定汇率，直到此体系瓦解。

这是一个单纯的美元本位体系，也不再能兑换为黄金，因此美国有效地决定着世界的货币政策，欧洲不喜欢这一体系因为他们认为它太容易引起通货膨胀。接着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法国财政部长、德国总理和财政部长赫尔姆特·施密特在六月聚头，并决定打破国际货币体系并废弃它——让各国自行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我的一个好朋友，乔治·舒尔茨，是一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但不幸的是，米尔顿对于货币事务并没有很好的理解和认识。不管怎样，这一体系因对欧洲来说太易引发通货膨胀而瓦解了。好吧，这是美国政策希望拥有的体系，也是这一段插曲的终结。

让我们来看灵活性汇率。如今，世界看起来不那么紧密联系——全球在太空中漂浮而非围绕美元打转。现在我们拥有188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不是188种货币，因为其中的17个国家使用欧元。但是只要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有170种左右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国家 and 单独的汇率。在这一体系中将没有连续性。因此所有的汇率必须和美元挂钩。如果在一个国家有200种货币，你就会发现有19700个汇率。当你有一个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你就可以将其减少到200或199个汇率，这些都基于那个计价标准。因此这其中有些有连续性，但是欧洲矛盾的加剧、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以及后来导致的欧元危机——所有这些开始分化美国的计价单位霸权，并开始破坏作为世界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元。这一体系的内部分裂成两半，因此它没有奏效。

以下是我想声明的观点——在金本位之下并没有系统性危机。金本位的问题可能是抛弃和重返黄金。当他们重新设立汇率，他们仍旧使用黄金，但是没有人买卖它。他们把金价从35美元/盎司提高到38美元/盎司。在一个月，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开了一个会，并将油价提高到相同幅度——你已经知道在1974年和1979年那些石油危机之时发生了什么，以及美元于70年代后期衰落，又于80年代初飙升。这引起了存款和贷款的危机，又引起了国际借贷危机。危机在那些喜欢低价借入美元，又将其投入借贷的国家中蔓延。政府们总是热衷于去借他们认为廉价的货币，之后又不得不用昂贵的美元偿还，墨西哥是第一个产生这类债务危机的国家。

当时汇率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包含在这一问题中，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洲危机中爆发。我第一次听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危机”的术语是在韩国，韩国就是这么称呼它的。也许这么称呼它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有些

不公平，但是那场危机的起因是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了。这让美元从1944年的1美元兑5.5人民币提升到了1美元兑8.7人民币。接着它由让美元下跌到大约1，美元兑8.28人民币，并在此价格上固定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墨西哥债务危机之后，美元价值就下滑了，而日元则走高到80日元不到兑1美元，在1995年4月是78日元兑换1美元。在接下来的三年间，美元兑日元汇率飙升到1美元兑换148日元。正是这场日元对美元的大贬值使那些紧握美元的国家陷入危机。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主要外汇汇率的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人一定意识到了这点，但是他们不能如此表述，因为这一体系正是他们为实现灵活汇率而提倡的。

接下来的是雷曼的冲击以及全球经济危机。尽管这样问很奇怪，但是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大危机呢？——当然，后来我们有了次贷危机。2007年8月7日和8日，各国中央银行、世界中央银行和欧洲央行召开会议，并在一天之内挤出950亿美元救市——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在那两天，其他的中央银行合计注资3000亿美元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和这场危机中主要银行的资金平衡问题。

但这不是那场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那场危机伴随着升值的美元而来，美元在2008年的夏天升值了30%。欧元对美元汇率在6月份是1.64，到8月份就跌至1.23。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一段时期内躲过了危机影响，而美国却深受打击，这场危机削弱了美国的房地产业和其他一切经济活动。

欧元的创建也加强了浮动汇率的重要性。之前美元还代表着主流，而现在我们有了两大板块。在欧元建立之前这个世界的版图，欧元的创立集中了欧洲的货币强权，在欧元之后，又有了另一大板块。它并没有美国和美元那么大。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欧洲有它重要的优势，而欧元也是一种很好的货币。我是欧元的坚决拥护者，当然也在1969年为它起草了第一个方案。欧洲持有太多的黄金，但是欧洲现在也有弱点——缺乏财政纪律，实行的福利安全改革因财政难以负担而怠惰，还有在进入欧元时代之前债务率高达100%，而马斯特里赫特协定规定的最高债务率仅为60%。欧洲达到了货币稳定，而非财政稳定。但现在重要的是这一体系下潜藏的问题。共有六个问题——这些问题在2011年法国成为G20的主席时就被提出了。尼古拉斯·萨科齐在担任G20轮值主席期间发表了我称为“萨科齐批判”的声明。他说原材料价格和外汇汇率都过度动荡，而这一体系也缺乏管治。原材料价格的不稳定在我所提到的时代即2008年产生。记得当时石油价格涨到148美元/桶，又在两三个月内跌到33美元/桶。这一惊人的波动在世界上史无前例。欧元的出现将世界主流一分为二，现在又为这个体系制造了一个问题。后果是美元不再那么重要了——它不再是锚货币了。中国的人民币还未紧盯世界经济，因为当美元和欧元升值的时候，中国就可能出现危机。当美元兑欧元汇率升高的时候人民币

已经在缓慢升值，而美元则在贬值。人民币在2008年夏天才停止了对美元的升值趋势，在6.8的汇率上稳定了几年，因为他们不能在美元升值的时候继续升值。紧盯美元已不再能给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带来稳定。随着中国的发展，人民币将会变得更强大，到达某一程度时它会仗仗GDP的力量取代美元。它还不会有金融债务。我们，罗伯特·佐利克和其他人，需要改革。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接下来的重大任务。

我们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0周年推动和考虑的是弄清楚什么才是修复现在货币体系的根本。我读过一篇由佐利克撰写的很棒的文章，其中呼吁重返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稳定地带——虽然我不会细谈——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要纠正这一体系的缺陷，美元兑欧元汇率的波动太大，这两种货币在加一起代表着世界经济的40%。如果你能固定这一汇率，并管控好它，差不多就像乔治·威廉提倡的那样，让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替代物，他主张英镑和美元被固定住。但是欧元和美元现在是关键的货币了，因此要稳定住两者的汇率。这意味着你不得不去采取一些措施来协调货币政策。你不能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方式去固定它，当时所有其他国家都固定了自己货币的上下限。有必要在两国政府的层面，用金融政策进行更好的协调。

具体的细节不一——赘述了。当QE3在去年10月份被推出之时，1欧元可能兑1.21美元，欧洲就将加入。QE3的好处是，如果他们没让欧元迅速升值（欧元飙升到1欧元兑1.37美元），如果他们将此汇率稳定住了，欧洲就不会遭遇二次衰退。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稳定了汇率，你就有了一个代表世界经济主流的新板块。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制定好政策。

最后我们需要谈到中国。让我以此结束演讲。这是中国兑美元的汇率，从1978年往上攀升，我猜这一图标并不在此终结。直到1994年的大贬值。1994年1月又出现了增长，美元升值到1美元兑8.7人民币。此汇率一直下降到2005年春天才稳定下来，固定在1美元兑8.28人民币，接着又有了一个快速的调整。现在这一汇率又接近6了。中国一直暗自让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我认为新的领导层应当认真考虑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通货性。中国理应成为国际化货币的一员，并合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区域。这两种汇率的其中之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固定了，因此现在只需要固定美元兑欧元汇率。你们正在解决这个体系问题，因为你们正在重新与世界经济的主流货币挂钩。我们当然也可以去考虑更好的替代性措施，但是这将破坏我主要想表达的观点，即建立一个将给我们的世界版图增添一个全球性货币的新体系，通过它来帮助修补像现在的货币体系。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 樊勇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系主任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金砖合作下的亚洲发展

非常感谢刚才的介绍,为了节约时间不客套了,直接开始我的发言。我的题目是金砖合作下的亚洲发展。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金砖合作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再谈一下金砖国家合作以及在亚洲的多元发展战略。

金砖国家在外交合作上有很多合作,但是内部的矛盾很多,因此可能成不了一个长远的合作。我们需要去思考金砖国家合作的长期性、有效性。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看法、观点供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在国际社会能否成为一支战略性力量的时候,大概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内部的稳定性,第二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和现有的国际体系,以及传统的国际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第三当然也体现在它能否对所在的地区出现有效的制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金砖国家合作的内部稳定性。我认为内部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体现着四个共同特征,金砖国家不仅具有共同的特征,大家都要转型、都要发展,这是共同的特征,同时对国际社会要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更重要的还有两条,就是他们已经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和采取了共同的行动。无论是从内部或者从外部来看,都是呈现这样的四个共同的特征。首先我们从内部看,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以及相互之间的务实合作不断发展。从外部来看,金砖国家已经和现有的国际体系以及传统大国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对话机制。首先我们来看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我认为现在金砖国家已经出现了政府和民间两个轮子共同推动

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从政府主导的方面来看,已经形成了每年一度的领导人峰会以及各界部长级会议、财长会议、中央银行行长级会议,同时下面还有负责落实的具体工作小组,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有效运作,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两个,一个是民间的智库组成的智库联盟,还有一个就是工商理事会,工商理事会是从5个金砖国家当中选出一些最有影响的企业家来共同推动金砖治理。中国参与的5个大的企业很多是民营企业,有一家甚至是发展不久的在深圳的一家高科技的企业,就是说民间和政府的共同推动是现在金砖国家生命力和合作机制化的一个共同特征。

第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许多国际场合,无论是在联合国或者是在20国集团,或者在其他方面可以看到金砖国家的领导人或者金砖国家的部长聚集在开会,相互协调立场,以一个共同的声音来采取共同的立场。至于一些具体的共同行动,我们最近可以非常高兴地看到,筹建金砖国家银行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我认为金砖国家的银行对于佐立克先生以前领导的世界银行不是个替代,而是个补充,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选择,让世界有更多的活力。同时金砖国家也建立了一个联合的外汇储备库,这不仅有助于减少金砖国家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而且也有助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稳定。还有金砖国家正在推进的一个就是贸易便利化,在座的可能对贸易便利化不一定了解,我稍微提一个数字。所谓的贸易便利化主要是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的下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海关,如果我们的运输,如果我们的商品检验构成的这些交易成本每下降1个百分

点，那全球将会得到 400 亿美元的收益，考虑到金砖国家体制上面的原因，考虑到金砖国家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推动贸易便利化对金砖国家合作是一个极大的意义。同时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过去十年当中金砖国家的相互贸易增长的速度是 28%，每年接近三分之一，过去的十年当中，整个贸易额已经翻番了 15 倍，现在大概三千多亿，再过十年可能达到五千亿美元的数量。

如果我们对迄今为止的金砖国家的五次峰会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十分清晰。这里可以归纳四点，第一个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公平、多极化的国际秩序，第二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更加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三要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朝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最近一个新的进展是一位巴西的官员将会出任 WTO 的总干事，我想由于他的背景可能比其他人更能够在 WTO 这样一个框架下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间利益的平衡和协调。

第四金砖国家强力主张通过对话以循序渐进，也就是说由逐步积累的方法来积极解决气候、能源、环境性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但是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金砖国家主动提出的自我的承诺，减排的约束，对于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起着极大的作用。这里面我要强调三个看法：一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而且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光靠现有的国际机制来治理和解决全球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的参与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同样的，还有我们在强调金砖国家如何如何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每一个金砖国家都和发达国家，和发达的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外交合作。刚才佐立克先生在演讲中讲的，中美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正在进行的谈判，这是一个。第三个看法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个多种的协商机制，合作机制。联合国 G20 以及金砖都是大家根据不同的议题，根据不同的选择来进行讨论进行协商来解决的。归结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把金砖国家的合作和发展看成是一个一个国际体系对另外一个国际体系的取代，而是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机制相互并存，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

我在这里还要提一提，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印度的时候提出的一条，他在印度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他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他说中国是现行国际运行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维护者，中国将愿意和印度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个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近十年来我们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国家定位以及对现有的国际体系



的定位两者相互关系的一个十分明确的阐述。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对于中国是国际运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同时也是改革者，明确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的立场，阐述了金砖国家的立场。

我们在讲到金砖国家合作的时候，不能不重视，不能不看到我们之间内部的许多矛盾，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宗教文化甚至于存在领土纠纷。但是我觉得与许多共同需要和长远的利益约束的或者要求金砖国家朝着合作和发展的方向。从政治方面来说，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希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希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以及合作共赢的理念。同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的比例是不断上升，2008 年也就是 4 年前是 14%，不到 15%。再过二三十年金砖国家将是世界经济的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仅给全球带来许多机会，而且对金砖国家相互之间带来很多巨大的机会。同时从生产要素，从人口、土地、资源、市场等方面看来，金砖国家容量恐怕要比发达国家还要再大。这里我举一个数字，最近国际上四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永集团对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人口做了一个测算，据它的测算，中国现在中产阶级大概一亿五千万人，而且每年以 10% 的速度在增长，就是刚才方主任所提到的中国城镇化的进展，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有 1300 个人由农村来到城市，从农民变成了市民，所以从经济、政策的长远角度来看，就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世界经济有波动，各个国家当然包括金砖国家它的宏观经济会有波动，有时会上升，有时会下降，它的汇率、出口都会有波动，但是这些长期的因素决定了金砖国家发展的有效性和合作的有效性。

金砖国家合作的生命力如何体现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一开始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有效的地区治理，这个有效的地区治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国或者一个大国集团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经济、政治的实力，以及国际影响来创造或者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繁荣、安全、

稳定。在这个方面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金砖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个别国家的概念，更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巴西和拉美，南非和南部非洲，俄罗斯由于前苏联的关系，它和中亚和东欧之间，都是密不可分。中国和印度，印度又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的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金砖国家都是代表着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典型或者它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今年3月份的峰会上金砖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5国领导人邀请了十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共同讨论如何促进南部非洲以及整个非洲的发展，可能明年在巴西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

作为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地区概念的金砖国家，它如何具体体现亚洲的多元发展上？这里面还是三个层次：

第一从全球来看，就是金砖国家所倡导的、主张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合作共赢这样一种理念是和亚洲的多元发展和亚洲的经济一体化一致的。从区域层面，我特别想请大家关注两个亮点，或者两个着重点，一个就是RCEP，还有一个是APEC，所谓RCEP，参加了国家中日韩东盟十国有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里面印度和中国的参加使原来中盟国家提出的构想得到了实际的支撑，光靠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现在RCEP正在和美国形成的TPP形成一个共识，这是最近亚洲经济合作重要的桥梁，确实我们中国至少在学术界对美国的TPP所包含的战略和外交的意图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也有许多的学者认为TPP有其合理性，它所主张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印度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情。刚才方主任提到改革和开放的相互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有更强的外来冲击。同时APEC明年将会在中国举行，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将会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像大家所讲的APEC已经是结束了。

最后还要提一下在次区域，东北亚合作，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和开放，是东北亚合作，现在东北亚合作主要是中日韩，由于历史、领土等等纠纷进展不大，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的开发将会使东北亚的地区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再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所组成的亚洲经济走廊，这个走廊把东亚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金砖国家在亚洲的合作以及亚洲的多元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亚洲的多元发展，亚洲的经济一体化将会不断出现新的局面，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闭幕式大会演讲



■ Andreas Löschel

德国国家能源转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 环境与资源经济及
环境管理所所长、教授
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德国能源变化及其对绿色亚洲的启示

各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上周，我在北京见到了习近平主席，他提到中国不会以环境恶化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并重申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能源方面来看，就是要在能源安全、经济成本与能源系统的环境影响间寻求平衡。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德国政府就已启动了相关讨论，当时，我们作了一个重大决策：要建立一个主要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系统。在 2007 年，我们制定了“能源气候规划”，2010 年，德国政府又确定了国家能源系统中的能源范畴。这一范畴着眼于长期，囊括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可行而又注重环保的方案，能够很好地应对能源供应这一 21 世纪重大挑战。今天，我是作为德国国家能源转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来到这里同大家交流。实际上，德国政府经常会通过一定的科学监测判断转型进度是否达到预期，或者确定需要采取额外措施的力度。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德国能源转型的现况、遇到的难关，还有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说到亚洲各国能源政策的制定，人们常会提到核能。大家都知道，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德国政府便决定要淘汰核能。但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这一决定其实很早就有了。早在 2002 年德国政府就和一些能源公司协议决定要在 2023 年前淘汰核能，现在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2010 年



大选后，虽然当时决定延长各反应堆寿命，但也只是延期6个月。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又让政府下定决心要在2023年淘汰核能。

我们可以看自2010年到2013年德国核电装机量的变化。你会发现过去几年我们的装机量一直在下降。再看这张，过去我们很多的核电站都是建在能源需求量大的地方，也就是南部的大型工业中心。但现在这种布局已经有了调整，随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稍后我会谈到这些。

正如我刚才说到，我们讨论的并非能源转型的全局，因为整个能源范畴非常宽泛，所以讨论将仅就某个方面而言。我们确定的能源范畴也为制定能源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要求，包括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2020年前减少8%，到2005年减少20%）；到2050年，我们要将运输业和建筑业的能耗降低80%；2020年前，我们要实现电力消耗减少35%，各类能源总消耗节省80%；此外，我们也看重能源利用效率，每年我们要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2%。

目前，这些目标实现程度不一。比如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对较好，现已成为一类主要能源产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我们的工作也是有条不紊。但其它方面，比如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建筑业的能效，我们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一举措留给我们的一大经验就是要着眼大局——不能只看到电力，还要考虑供热、运输等，我们需要面面俱到，全盘考虑提高能效，增加可再生和低碳产品的使用。

本轮讨论中提到了许多关键问题，比如像如何应对能源供应的全球化、传统能源应该保留多大的比例、怎样提高能源利用率、怎样储备能源，等等。就目前来说，德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储备，实际上我们能储存电能至多能用15分钟。如何改造电网，如何设计才能使其兼容传统供电系统呢？你只要看一下德国的能源生产状况，就可能惊奇地发现2011年德国发的电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燃煤。实际上当时45%的电能都是来自于无烟煤、褐煤。尽管去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上升到了22%左右，但是还没有一种可再生能源能确保我们完成这些目标。但与此同时，由于煤价连年下滑且燃煤不受碳排放交易系统处罚，煤炭的占比在去年也有所增长。有这样一种廉价原料在，要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便只能依靠煤炭政策了。这就是说，要完成减排目标光靠可再生能源是不够的。

我刚说到过，尽管去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了，但是碳排放同样也增加了。我认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可

再生能源之所以迅速崛起，主要推手就是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法》。这一法案对燃料技术性费率作了长期规定，使能者优先进入市场并在并网环节中享受优惠待遇。透过这个框架设置，你会发现种种可再生能源开发几乎不用承担任何经济风险。我们打开了市场，你不用管需求如何，只要用可再生能源发好了电然后把电力并入由电网公司接管或提供的网络就可以了。

从费率上看来，以光伏能源为例，它的补贴实际上一直在降，但许多其他技术的补贴却一直较高，近几年来非但没下降还有渐长趋势。另一个例子是海洋风电开发，这与当前中国的讨论非常切合。其实在德国也有这方面的讨论，我们打算在2020年将海洋风电装机量增加到1万兆瓦。现在我们离这一目标还很远，所以我们提高了针对海洋风电的补贴。因为这项技术成本高昂，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模仿”也难以大幅降低成本，所以我们对这项技术的支持力度没有减少而是加强了。而光伏技术则是唯一一个增长迅速的。光伏在中国来不是一个新鲜的词，由于中国供应商竞相压低光伏面板成本，导致了过去几年补贴快速下降。

那么这结果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到可再生能源中风力和太阳能占比增长迅速，特别是太阳能的装机量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突破了32千瓦。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能源是如何输送的。我们的风电多集中在北方，太阳能则在南方多一些。但是尽管北方风能资源丰富，但是需求却主要集中在南方，这一问题我想对于中国来说有许多相似之处。关于风能我这里有三张图，左面两张显示的是德国的盛行风向，这张图上橙色和红色标注的是风力资源丰富、适合发展风能的地区，第二张图上标注了德国北方已建成风电站的布局，再看右边这张图上的绿色区域，这是在中国，风能也是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同样的你可以看到需求也是集中在南部和东部。跟德国一样，中国如果要依靠可再生能源的话就得解决好远距离输电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们要好好考虑怎么将北部的资源与东、南部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巨额电网投资，在德国我们也需要应对这样的资金和可行性双重挑战。我们需要大型电网来将电力从北方输入南方，但是大家对于电网负荷大升级意见很大，所以建造起来会遭遇了种种困难。所以我想，把可再生能源从富集地输往需求地这样的难题今后可能也会在中国出现。正如我说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早晚会遇到，随着距离的拉长，电网的负载和分布都需要考虑到。在德国，



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将大量电力调配给监管电网扩建的调度方，让他们做好电网的进一步升级规划。这一举措已经初见成效，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些经验供各国参考：电网扩建规划需要同供电系统的调度方共同制定，新电网的建设也要与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投资规模和区位相适应，然后这些规划需要有可靠的融资计划，优先项目还可获得政府资助，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希望能在整体上缩短新电网的建设周期，在德国新电网的建设时长要在十年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为整合可再生能源做好准备，就必须加快步伐。

另一个可再生能源传输的问题就是调配监管（如能源产品的转换比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可能也会遇到。目前来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在9%左右，但是随着这一比例的增长，问题就转化成传统能源应该保留多少的装机量了。当然对于可再生能源，我们要灵活应对，要考虑到无法获取可再生能源的情况，比如碰到无风或者阴雨天气怎么办，我们在德国时常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储备能源的话，你就只能增加装机量，但随着传统电站效益日渐低迷，这一问题在德国愈发严峻。使用可再生能源是有补贴的，这让传统电站丧失了融资吸引力并面临亏损。可再生能源在市场上大行其道，电力批发价格不断下跌使得油气电站盈利持续降低，这就是现在德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令我们欣慰的是，虽然对能源市场的监管放松了，但我们的装机规模却有大幅提升，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但保留常规能源依然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难题。最后我想谈一下电价，大家看到的这三张图，分别是居民生活、工业用电的价格，以及德国家庭的能源总花费。首先看生活用电价格，大家可以看出在这个走势中，这一块蓝色区域也就是发电部分的价格有一定上涨，但黄色部分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才是抬高价格的主要力量。实际上，价

格增长的大部分是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现在的补贴幅度是每度5.3欧分，要知道现在中国的用电总成本在每度28欧分。所以，德国的电价在世界上是第二高的了。这还只是生活用电。再看工业用电，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这让很多人担忧，特别是德国企业，他们担心竞争力会因此受影响，因为对手可能来自那些不那么支持可再生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地区。我们要谨慎考虑这些问题，并不是怕能源转型受阻，因为如果生活电价过高，可能人们就不大愿意为可再生能源买单，如果工业电价过高的话则带来失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把把握好一个度。

最后我想作些总结。我们的能源法案和淘汰核能计划可能需要大概十年时间来实现，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作为不多。只是在过去两年才采取了很多措施，尽管福岛核事故无疑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但不可否认自2002年来我们在这些政策的施行上耽误了很多时间。除此之外，我还讲到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在能源保障上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和装机量相关。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我们要着眼全局，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灵活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方案。

依照我们的规划，这20年里我们有一笔固定的专款来推行能源转型。这一规划非常保险、代价高昂。如果中国需要推进这样的转型，最好采用补贴政策，要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话还应该制定经济可行、灵活弹性的方案来应对将来的状况，否则就可能就因为成本过高而难以实行。当然，上海论坛集结了亚洲的智慧，正如中国人常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就是说看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多种。我相信中德合作将使我们两国获益，我非常期待在将来进一步推进两国间的合作。谢谢。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 **Hélène Rey**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亚洲的金融发展

非常感谢，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同时我也非常高兴来到这所著名的学府。我6岁的女儿现在正在学中文，当然现在让我用中文演讲还不是时候。今天我将会和大家去讲一下亚洲的金融发展，这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又很有意思的过程，我会重点讲到其中的几个趋势。首先我想给大家全面回顾一下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在中欧以及中美关系背景下的一些影响，然后我会全面探讨一下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国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民币在未来的角色。

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极其艰险的时期。我们遭遇的这场危机规模之大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同时还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震荡，可以说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严重的危机了。要找到这样规模的金融灾难，可能我们还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2008年，当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在慌乱之中忙于达成协议时，我们看到了一串串经济危险系数、商品和服务业数据以及经济增长指数暴跌，速度之快远超大萧条时期。当时，决策者当中确实弥漫着一一种担忧，他们不时在各种情形下表示必须制定一些宏观政策来应对这次大波动。通过这张幻灯片我们看看当时各个经济体的增速，可以说世界各地都是一泻千里，同样受影响的还有全球贸易额以及亚洲出口总额。刚才我说

到过，要想找到与之相当的危机，我们得回到大萧条时代。今天在一些地区，包括我所在的欧洲，当我们回过头来试着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思考得越多便越发觉得这与贸易增长、金融市场的崩溃以及危机中的资本生长关系紧密。通过对新兴市场以及近来对发达经济体的观察，一些国际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都不断有这样的发现。实际上，当前的信贷增长、信贷流动、资本增长以及所谓的投机热潮都在危机中以及当前的世界经济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渠道。

当国际的流动性较强的时候，比如像现在，还有过去2003年到2007年，（实际上当前的情形更加严重），国际的流动性和投机潮都很盛行，而这两者都可能会突然大规模转移从而让股市崩盘、或者给某些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掺入泡沫，在房地产市场，这种泡沫尤其毁灭性。我们已经见证过这样的情形重复上演，资本流在世界经济中游走，有时候我们看到国际流动性很强，有时候又看到了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在房地产市场这样的泡沫更为常见。

银行放贷在这期间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银行的贷款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我们在亚欧地区常见到的流动是从那些有大量存款、私募基金的国家流入欧洲边陲特别是南欧各国，这些流动带动了当地的房产投资，增强了当地的竞争力但最终也会让它们



走向崩溃。这样的兴衰周期在很多方面都让人回想起 1997 和 1998 年间发生在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们也见证了一轮由盛转衰的过程，先是房价飞涨和资本膨胀导致了通胀，最终汇率暴跌泡沫随之破裂，但很多人的报价都是基于美元，大量企业也因此破产。这样的情形由来已久，已经重复上演了几个世纪，其实有一本有趣的书专门指出这次危机与之前并无二样，没错，我们现在讲的资本流动、金融危机同过去八百年的荒唐金融史并无不同。

然而这次对于亚洲来说，事情似乎有所不同。我这儿有张地图，上面描画的是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从 2008 年至今，许多金融体系都接受了危机的考验。图中的红色意味着你陷入了危机，红色越深就说明你的系统性危机越严重。一定没人想被标成红色吧。但从地理位置上我们看到红色区域多在欧美地区，尤其是在冰岛、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这些国家的银行业出现了问题），而亚洲却幸免于难。

第二个有意思的特征是危机的演化，我们可以把它和 97、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作一个对比，当然现在许多外部信号都与之前不同了。在当时，韩国、印尼等国有很多外债，所以在危机之前他们的赤字很大，资金流大量注入使得经济发展过热。但这都是通过赤字向别的国家借贷然后用于消费、投资和购买更多房地产。接下来房价就会骤然下调，然后我们看到大量资本外流，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归零或均化，这就使得汇率剧烈震荡，酿成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这一次亚洲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经过 97、98 年间的调整，我们看到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赤字都已经变成巨额顺差了。而在这一轮危机中调整最多的是实际上是新西兰，在韩国、中国我们几乎没看到

任何调整，就好像危机根本没发生过一样。这也意味着现在亚洲经济更具韧性了。这一信息也可以从这张地图上读出来。我们给这张图标注了不同颜色，没有人希望自己被标成红色吧。但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标上了绿色，那就表明你表现得很好。那么，我们该怎么解释亚洲金融系统在这一次危机中的表现呢？让我们看看信贷增长状况，我刚说过，现在信贷增长迅速，这使得房地产和其他行业出现了泡沫，实际上这一次金融危机同样也有这种状况，我们发现美国和欧洲又被标上了红色，那里可算是信贷过度增长的中心，反观亚洲却是依然不受影响。

再看一下经常项目赤字也是跟刚才大同小异，这也是你向其他国家的借贷情况，如果你借贷太多的话，发展就难以持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资本大幅调整、外逃到美国、拉美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无法进行很好的调整，在 1998 年，资本又相对往俄罗斯等国集聚。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些地方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这国家有美国，还有些欧洲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亚洲却截然相反。同样的道理，借得少自然不会欠下什么债，所以看到这几张大同小异的图也没什么奇怪的。这些图显示的是各国的债务净值和总额，我们又一次发现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处在红色区域，而亚洲各国的债务则少得多。

所以我们将刚才各因素汇总起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一轮危机中亚洲能独善其身。但是我认为，在取得这样的成就后我们绝不能自满，而是要从中学到了教训，在整个经济周期中，我们要密切地来监控信贷的增长情况以及资本流向。接下来我也会讲一下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将来资本自由化可能会在这一地区产生更大影响，这一可能也会面临更多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资金流入中国等国家。所以我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轮资产价格和信贷的兴衰更替，它不仅仅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上世纪 80 年代拉美经济危机的再现，而和同时期亚洲出现的问题一样，适用于每一个国家。有的国家可能觉得自己监管很到位，但事实未必如此。我认为这场危机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就是各国央行只专注于控制通胀而未能履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指责。要想解决信贷增长过快、资本流动放缓以及资产价格失控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让各国央行在发现信贷增长过量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

泡沫时及早介入，这一点尤为重要，对于那些正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的国家，譬如说中国更是如此。就好比我们发现西班牙或者爱尔兰经济中充满泡沫，如果你只是等着，眼看着五年过去了、十年就会过去再去介入，但那时已经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进行持续的压力测试的话，央行就要通过波动来对金融中介以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监控。把握得当的话，通过适当的波动可以让资产负债表不因过度依赖资产价格上涨而难以抵御风险。发达国家的政府过去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2007年危机开始酝酿时，各国央行都忙于抑制通胀而无暇关注各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当然我们并不是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对于中国、对于亚洲来说，我认为这一问题与你们关系尤为紧密，因为亚洲的金融业，虽然发展很快，但总体上来说，由于起点低，亚洲金融业的规模放在世界上来说还是比较小的。东南亚国家和印尼的银行业资产占的比重，低得可怜，实际上亚洲多数国家都是这样，但是看这边的全球金融市场需求增长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近来增长很快。我认为未来几年亚洲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令人期待。我这里有一张表，可能会让你吃惊，上面标的是利率衍生品的日柜台交易额，这里有很多标度，我们看一下这些衍生品的增长情况。左面的数据是全球每天的衍生品交易额，这是个大数字：3万亿。每天有3万亿的资金投入到这些衍生品交易中。亚洲是这条红线，只有1500亿，但是它的增长态势很强劲。就亚洲金融系统目前的规模来说，还不能和欧美相提并论，但是未来几年亚洲，特别是中国金融系统与世界的关联性肯定会越来越强。所以，各国央行应该要提前预警，避免重蹈之前的覆辙。

虽然现在亚洲市场在全球的比重还很小，但它却发展得非常快，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来说这意味着什么？现在要是有人问什么是主要的国际货币？不管是外汇、股票、货币还是发行金融资产都要和什么挂钩？那答案显然是美元。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美元就成为了唯一占主导性的国际货币。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美元取代英镑是在20世纪发生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逐渐壮大，并成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就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并超越英国，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要更替国际货币可不容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可以

看到贸易商的货币很可能会取代原先的主导货币。你看美元已经取代了英镑，依照现在的实体经济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合理地去进行猜测，可能到某个时间人民币可能会成为美元的挑战者。当然对于人民币来说，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也会遇到了一些国际上的阻碍。第一，人民币的可兑换性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在自由贸易中，还不能自由地兑换人民币。第二，人民币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高效结算市场。第三，人民币在金融领域中的基础设施现在还很薄弱。由于人民币起点相对较低，离岸市场也才刚起步，而且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例也非常小，所以现在来讲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多挑战。在伦敦的交易市场中，人民币交易占比是非常小。作为一个国际货币，人民币确实处于次要地位。虽然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开始用人民币定价，但是数量还是很少。总之，人民币还没有做好准备挑战美元，但是如果我们能打开一个更高效率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让结算更便利，特别是要向非居民开放，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说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最后，作为总结，我想说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破坏非常严重，时至当前依然如此，或许只有大萧条能与之相提并论了。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亚洲避免了灾难的冲击，尽管不是毫发无伤，但通常说来新兴经济体更容易受影响，但这次我们看到的情形却并非如此。我相信这与亚洲的现金储备和资本增长息息相关，我也相信按照世界经济当前的发展态势，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金融业将有很多发展机会。我们要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要密切监控市场，避免重蹈发达经济体的覆辙。还有一点很重要，只要人民币机制和政策变革得当，我相信人民币一定能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但这也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实现的。谢谢。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闭幕式大会致辞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尊

敬的冯校长、尊敬的林校长，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即将为上海论坛（2013）闭幕，当我们本次的会议平台在 05 年推出的时候，当时每个人其实也都意识到我们欣欣向荣的发展的大都市的历史的重要性以及意义，该大都市就叫上海。

在过去一个世纪，上海市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东西方的桥梁不断的发展，同时上海市也是新兴的文化的象征，并且通过多元化的发展也是展示了无限的创意，我认为我们的上海论坛其实也见证了我们这个和谐发展的一个里程，我希望本次的大会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想法的交流，从而在未来打开新的思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学术交流是未来讨论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想法和理念的交流，我们是无法实现突破和创新的，法国的作家雨果也是有类似的表述，可以去抵御外来的入侵，但是对于想法的进入我们是无法抗拒的。

基于我们传统的相关的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智力的交流，所以英格兰的作家威尔士也说了，其实人类从属性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理念和想法不断演进的历史，所以今年的大会，在我们国际的最新情况的背景下召开，现在国际社会一些重要的国家都出现了领导的换届，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现在

确实是时候由那些顶级的领导者和思想者和学者进行彼此只智慧的交流和擦出智慧的火花，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合作。

在过去三天，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有很好的机会表明你们的想法，并且和其他的参会者展开开诚布公的一些沟通，我们总共来自于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者展开了交流，在我们论坛的过程中，确实我们也审视了亚洲经济奇迹和崛起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问亚洲奇迹已经要结束了吗？我们是否把一些亚洲巨龙以及四小虎进一步复苏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上海论坛确实是全球最优秀的论坛之一，在我们这个论坛的基础上，我们也是非常关注金融相关的一些议题，所以我们今年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世界知名的一些金融专家，包括瑞教授，通过她的演讲也给我们带来很大



的贡献，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她的一些洞察。

我希望今年的讨论将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并且提高上海论坛的影响力，讲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精神，之前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东亚经济一体化还是抱有一些微观的情绪，人们通常会把同亚洲和欧洲进行一个比照，并且指出两者之间可能差异性比这个相识性要更加的显著，然而我们必须记得对于区域的协调，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当时人们诸多怀疑欧洲是否在整个区域实现协调，当时很多人认为一体化是不可能的使命，当时在欧洲的一些不同的国家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分析，所以我们不是要直接的去复制西方的模式，我们这边对于东亚的一体化的精神要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关注我们东亚一些重要的凝聚力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今年的论坛，其实对于我们的和约法和原则的立法进行一些讨论，对于我们区域的一些相关的整合以及一体化奠定了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要求同存异，基于相似点和相同的运用共同构成我们未来机遇发展的基石。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放到找到我们的共同点方面，而不是说互相来攻击对方的不同的想法。我们知道从2008年以来，我们在全球的例如能源、环境、食品、发展、城镇化、金融，包括欧元区的整合的进程，进行了讨论，包括城镇化和环境相关的问题，现在在亚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些浮现的问题，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讨论，除此之外，目前亚洲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面临着与日俱增的挑战，确实有这么多挑战，这点我们都认同，但是我们必须要停下来思考到底什么带来了这样一个挑战，我认为我们真正做的就是直面现实，更客观的来找到背后的真正的驱动力，更好去解读哪些因素是可以攻克的，哪些因素是真正的危机？我们应该拨开现象的表面，我们上海每一年都能够就一些观念的问题进行审视，并且对未来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借此机会我想表达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三天的讨论包括一些结果，都做了一个成功的企业论，我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发言和建言献策，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对于我们最后的一些闭幕环节，也做了一些总结。

包括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话题，我们在这个论坛过程中，也建议明年可以最后安排一个总

结环节，把一些重要的智慧的火花和要点进行一个总结，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进行最后的一些陈述，作为一个回顾，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在座的各位，对于本次论坛的参与，还有你们的贡献，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感到非常荣幸对上海论坛作出贡献，让我们感到非常荣幸，通过这个讨论让我们在亚洲实现共同的繁荣。

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以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校长，以及优秀的校职员工，你们非常好的组织给我们打造了这么好的平台，特别是本次会议的主办方，我们这个平台也是领导性的思想家们的乐园，同时我这边也想特别表达对于副校长以及张义教授的贡献，感谢你们所做的安排，特别是开幕晚宴，地点让我感到非常印象深刻，不禁让我想起19世纪末期上海的一些风味，最后我也想去用屈原写的离骚中的诗来结束我的闭幕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上海论坛(2013)年会期间,组委会邀请复旦大学知名教授对论坛开、闭幕式演讲嘉宾进行专访,听取他们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洞见,及对亚洲发展的思考。

VIP
访谈

我们重新回到了缺少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

Robert A. Mund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担任包括多个国家政府、联合国、IMF、世界银行、欧盟、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美国财政部、泛美开发银行以及全世界多家公司和研究所的顾问。

■ 采访者:张军、林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编辑:Robert Orr、车锐



66

欧元区的诞生产生了一个可以同美元相抗衡的货币区。而中国的发展也预示着它有获得与美元区和欧元区同等地位货币区域的潜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对于这样一个即将成

张军、林曙: 您对现今的货币体系怎么看? 您对未来国际货币构架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Robert A. Mundell: 2014年距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整整70周年,当时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共同讨论设计战后的货币体系,那我就以这个事件开始说起。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重创以及金本位制的第二次崩溃,人们需要为将来打算。尽管仍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经济学家们仍然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战后的货币体系,该体系固定了美元兑换黄金的比率,并将其他货币同美元挂钩。这个体系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地非常顺利,当然中间也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最终却被另一个新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替代。

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了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1971年,伴随着尼克松总统取消美元同黄金的自由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其他国家也将自己的货币同黄金脱钩。那之后不久,这些国家在华盛顿加入了史密森学会,又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时代。但这也维持不了多久。纯粹的美元本位制是一个单纯的汇率,但是对于如何确定、谁来确定通货膨胀率却没有一个共识。之前,黄金的总量可以决定这一切,现在由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决定。但是由于欧洲国家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欧洲来说过于宽松,不愿意使自己的货币升值,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仍然缺乏共识。

因此,在1973年6月,各国决定废弃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允许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出现。这个问题并没有任何协议。欧洲各国希望重回固定汇率体系,其他的一些小国家也希望如此。最终,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协定条款获得了修订,之后我

型的新兴的，并包容了不同结构和政治力量的体系，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是最优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抛弃当前的旧货币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货币体系的机遇。

99

们就有了现在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欧元区的诞生产生了一个可以同美元相抗衡的货币区。而中国的发展也预示着它有获得与美元区和欧元区同等地位货币区域的潜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对于这样一个即将成型的新兴的，并包容了不同结构和政治力量的体系，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是最优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抛弃当前的旧货币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货币体系的机遇。

张军、林曙：到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货币体系似乎还运转良好。当前的问题似乎同传统的困境联系不大，但却同现在的金融危机有更深的联系，这一点看起来非常特别。对这一点您怎么看？

Robert A. Mundell：从数学的角度看，认为所有 IMF 中的国家可以毫无影响地使用灵活和有管理的汇率的制度，施行货币政策，实现各自的通货膨胀率的想法是极其可笑的。IMF 中有 188 个成员国，欧盟区的 17 个国家共有一种货币，而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大概 171 个国家各自都有各自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独立的价格体系。几乎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价格，也不太可能发现一个最经济廉价的市场。有成千上万的价格需要处理。从某些方面看，这是相当成功的，因为美元充当了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单位。

除此之外，仍然存在一系列的 systemic 风险，这些风险多年来持续地损坏着国际货币体系。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 80 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该危机时由于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违约造成）等。同样也有储蓄贷款危机，例如 90 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以及前不久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有的这些都起源于汇率的大幅波动。80 年代的危机就是由于美元走弱，欧元大幅升值引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弱势的时候借入大量债务，但是接下来他们却不得不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偿还这些债务。这导致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面积破产，从而引发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最初的导火索是 1994 年人民币的低估，但是 1995 年到 1998 年日元的贬值有着更加严重的影响。美元兑日元的比率从 1 美元 80 日元下跌至 1 美元兑 148 日元。这就造成了美元的强势，接着波及到所有其他最终深陷亚洲危机的国家。而伴随着 2008 年次贷危机以及 2007 年 8 月美联储大范围救助而来的金融危机，也同样是因为美元的升值。正是由于美元作为一个安全资产的想法使得弱势货币变得更加弱势，从而导致了汇率体系的巨大波动。

紧接着，2011 年，轮值 G20 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对国际货币体系做出了 3 点批评。他首先指出了原材料价格的过度波动，其次，他批判了国际汇率的不稳定，最后，他提出，由于像 IMF 这样的组织权力较小，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监管。当然，还远远没有到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地步，但是考虑一下这些无效率的问题，并且找到一些方式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国际汇率的不稳定。如果我们无法稳定美元兑欧元的汇率，那么全球货币体系也将不复存在。汇率的完全波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货币体系。

张军、林曙：控制过度的波动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一些学者提出采用一种全球货币，另一些学者认为采用其他的储备货币。那么您对这些建议是如何看的呢？

Robert A. Mundell: 如果有不止一种货币的话, 那么建立一个全球的货币体系是非常理想的。这就好比在每个人自身母语的基础上又多了一种共同的语言, 从而各国的人们可以互相交流。

这种每一种货币都可以与之兑换的货币的职能, 就像过去的黄金一样。在金本位制下, 不存在固定的汇率制度。所有的货币都直接同黄金挂钩, 黄金通过自由市场决定了汇率, 这就使得国际的汇率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是固定的。

困难就在于如何能够找到一个黄金的替代品。黄金无法制造出来, 它们只能从地下开采出来。因此它就有独立于货币之外的很大的内在价值。在缺乏一个世界政府的前提下, 各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没有纸币、使用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吗? 我完全支持这种想法,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却没有这种设想。他们确实有一些计划, 但是却从未真正实现, 因为各国在政治上没有对这些计划达成一致, 并且当时的美国对于如何运行这种计划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想要强调的是, 当今的货币体系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当然也不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它是非常有效的。在这期间, 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金本位制下, 这会导致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流出, 从而引发危机。美联储持续印发货币的能力使其具有类似于央行的职能, 支持了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来说, 这创造了奇迹, 使其能够运用外国投资建立起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并不想毁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 它有些方面还是不错的。也许是存在的时间太久了, 但是对于未来的货币体系, 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保留现有货币体系的一些机制。新的货币体系应该是非常灵活自由的。尽管对于建立一个灵活的货币体系有一些批判, 认为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 但是目前的货币体系却没有造成通货膨胀。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我们必须考虑三个主要方面: 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出改进。最大的改进就是要稳定美元兑欧元的汇率。中国的汇率是盯住美元的, 因此当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变动时, 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也会出现波动, 这就会带来问题。现在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点。但是, 在缺乏是一个世界政府的情况下, 我们能有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吗?

张军、林曙: 您认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有可能成为全球货币吗?

Robert A. Mundell: 我个人认为, 特别提款权不会成为全球货币, 因为一篮子货币无法成为货币。这就像将美元、日元、欧元, 将来还会有人民币混在一起, 你就得到了由这些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只要汇率是波动的,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用这种货币来进行债券定价。如果它们之间汇率是固定的还好, 但是问题在于, 它们的汇率不是固定的。当特别提款权诞生的时候, 它没有以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被进行过估价。它被定价为一盎司黄金的三十五分之一。在1968年, 一特别提款权的价值被定为等同于一黄金美元的价值。接着, 在1974年, 当一篮子货币体系被设计出来, 黄金定价基准的机制就被冲破了。这样的一篮子货币机制有很多好处, 但它却不是货币, 也不是一个实物的计价单位。在这个特性上它们就逊色很多。现在它是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良好工具, 同时也成为了提供对外援助的工具。发展中国家积极倡议特别提款权成为援助手段。在这个领域里, 特别提款权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但是这和国际货币体系却没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保留着特别提款权, 同时也承认它不能成为货币吧。它是5种货币的加权平均, 是一种提供外援的良好手段。

张军、林曙: 那么您认为欧元区是一个理想的货币区吗? 一些人认为, 对于欧元区来说, 有效的流动性水平太低, 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性。

Robert A. Mundell: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人们只是看到国家内部没有大规模的移民。人们没有看到德国人离开德国, 没有看到在较为落后的地区, 如波罗的海区域的国家的人口外流。人们只是没看到人口的大量流动。欧洲的人们大都很喜欢呆着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是流动性却并不缺乏。德国的劳动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现在有大量的土耳其劳动力已经进入德国。现在需要的劳动力移民的种类和那些填补这些空缺的劳动力种类直接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而问题的根源却并不是劳动力缺乏流动性, 而在于, 如果存在劳动力过剩的话, 在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地方的失业者的种类并不是德国这样的国家所需要的。

甚至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现在的失业率为7.5%,

大约 200 万人口。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不断有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面临失业。他们无法获得现有的职位空缺。在法国，我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数字：那儿有 300 万的失业者和 300 万的职位空缺。他们没有将这两个数字混合起来，是因为劳动力技能不匹配。这是结构性失业的一种。欧洲的问题同欧元引进之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在 70 年代，这种低教育水平的失业者在整个欧洲是非常多的。60 年代，欧洲政府支出大幅上升。我曾经做过一次这方面的研究，政府的支出在 70、80、90 年代平均占到了 GDP 的 25%。这个比重一直上升到了 50%，但是投向却不是基础设施，而是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以及医疗计划。人们希望这样，政府在启动这些改革的时候也很不负责任地在迎合着人们。

但是政府却没办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为这些支出埋单，这造成了政府财政赤字的高企。意大利在进入欧元区时，财政赤字达到了 GDP 的 120%，希腊达到了 GDP 的 110%，比利时达到了 GDP 的 130%。即便是这样，仍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那些无准备金的负债也必须加以考虑。当你纵观数十年来的经济重创，你会发现政府都在无准备地利用财政预算来弥补支出。真实的债务规模要远远大于表面的。这些个别国家面临的负债或者说超支问题就像潮流一样在欧洲区内蔓延。

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在福利上的支出同德国的水平相近，但是它的人均收入却比德国低得多（德国人均收入是希腊的 2.5 倍）。因此，希腊陷入破产，必须得到援救。现在希腊不得不节俭开支，但是希腊人却将失业问题抛给政府解决，并进一步加深了财政赤字。无论怎样，希腊已经做出了一些重大改变。原来希腊的 1000 万人口中的 90 万是政府公职人员，这个数字近似于总人口的 10%，现在这个数量已经降到了大约 70 万。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不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强调人们必须做出一些计划以防止遭受损失。有些情况下，你必须制定一些税收政策，但是过高的税率又会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经济运行。

解决这种困境的一个方法是采用更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许多人都考虑到了这一点，这其中包括欧洲央行高层 Mario Draghi 先生。无论是什么样的指令，欧洲央行都表示绝不会采取任何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措施。没有人想要这样的措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指令，那就是为了拯救欧元，Draghi 将会采取一切措施。其中一种解决方式就是使得欧元的汇率走高。去年这就发生了，这是银行的失误。

要么各国都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要么就必须有一个

能够管制各国的更强的财政中央集权。如果想走出目前的困境，各国都需要稳定自己的支出。德国相比其他国家更加愿意借出更多的资金以帮助恢复其他国家的稳定。但是建立一个像欧盟区一样的货币联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主张。9 个国家已经面临破产，其原因并不是缺乏财政联盟，而在于国家的支出。国家财政长官可以稳定支出的增加，也可以消减支出，但是这需要一个大面积的权力转移。

张军、林曙：中国采取了切实的步骤来稳定金融系统。最初，中国使用了一个固定的汇率体系来控制通胀，但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大量盈余。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重新估值？

Robert A. Mundell：许多人建议调低美元价格。在 1997-2005 年间，当人民币以 8.28 的汇率盯住美元时，美国人坚持称，应当将汇率降到 4 或者 3 人民币一美元。这会导致更大的失业率，同时摧毁中国的经济。在 2008 年，中国深受欧元区经济危机重创，因为随着美元兑欧元的升值，人民币也在兑美元升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将自己的汇率定在 1 美元 6.8 人民币的水平，并仅允许缓慢升值的原因。这种策略效果非常好。只有当维持固定汇率会造成过度通胀的情况下，中国才会考虑货币升值。

张军、林曙：中国在金融市场上对资本实施较强的管制。您认为中国应该放松资本管制吗？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吗？

Robert A. Mundell：当着对中国自身有利的时候，中国就应当放松资本管制。我认为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会使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也会立刻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之一。放开汇率的管制会统一股票市场。上海在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会有很快的进展，这也会催生出更多的改革。信用评级机构也必须更加开放，才能够进入中国，帮助评级体系的建设。中国拥有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的潜质。

洞察中美关系

Robert Zoellick

第十一任世界银行集团总裁、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采访者：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 编辑：陈杰



66

“网络安全”问题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全方面危害，因为两国在该问题领域缺乏一项明智的政策框架。

99

吴心伯：您第一次到访中国是什么时候？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Robert Zoellick：1980年，我在香港担任研究员。我携夫人一起取道澳门到广东省旅行。彼时的香港与现在非常不同，我有机会亲眼目睹正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巨变。1989年，我随老布什总统访问中国。自那以后我又多次故地重游。最令我着迷的一件事情是去观察中国的其他（之前没有到访过的）省市。许多外国人关于中国的印象仅仅来源于游历京沪两地。而我在长期走访中国其他地方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

吴心伯：在官方职责之外，您个人一直对观察中国发生的变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什么事情是您感到最为有趣的、最吸引人的，或者最难理解的？

Robert Zoellick 在大学里我主修历史与经济——历史是我一生的兴趣所在，它令人拥有独到的视角，以解读当前时事，纵观历史变迁。我通过历史环境来思考中国，这对于试图理解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我最近有读到一些以重新解读历史为基础的中国研究书籍，这些研究非常引人入胜，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在中国话语中占据主导的一项叙事是“百年屈辱”，即清末中国积贫积弱，被迫与列强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等；当下中国的大多叙事都与超越这段屈辱历史相关。这些历史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它表明，在过去200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远比单一叙事要复杂：时而和睦友好，时而紧张恶劣，更有些时候仅仅是互动的问题。

中国和亚洲即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史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邻国之间相互交流观点、探讨历史，对于理解历史和展望未来都非常重要。在应对安全议题，尤其是北朝鲜、钓鱼岛和南中国海争端等主权问题之时，做足历史功课十分必要。

吴心伯：除了对历史的研究，您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同中国人相处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个人互动方面的经历？

Robert Zoellick: 第一点, 与我同一代的中国官员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前这一代领导人而言, 权力的危险性, 动荡的危险性, 以及在法治与社会碎片化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性, 都至关重要, 并且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是在地方官员进入北京的政治环境之前去了解他们的观点。相比于在北京的交往, 与各位党委书记在他们本省会面显然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 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制定过程并不具备非常好的认知。这也与中国政治体制的相对不透明有关。

第四, 在美国进行的有关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理论”的辩论, 一直受到个人互动中安全和经济议题领域的不同观点的影响。打个比方说, 一些在安全议题领域和中国打交道的人, 比如亨利·基辛格, 可能会认为中国关于自身国际角色的观点是建立在中央帝国和朝贡关系等概念之上的。因此, 中国对国家间体系的规范和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提升。而另一方面, 同邓小平和朱镕基两位领导人打交道的美国官员则对中国问题持有不同的认知, 邓实施了经济改革, 朱则带领中国加入了WTO、接受了其制度与规则并推动经济体系转型。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面对着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 这个理念背后的意涵是什么? 无独有偶, 我发表的关于中国转变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也引发了辩论, 众人对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存疑。在西方, 这一辩论的内容是: 假设中国不愿接受当前的国际体系, 那么究竟哪些(体系规则)是其意图改变的?

在解读领导人时, 理解中国正面临的系统性挑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在过去30年内展现出了聪明才智、勤恳工作、奉献精神 and 充足的能量, 所以, 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态度)不仅涉及中国领导人的认知, 同时还与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能有效发挥自身能力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

吴心伯: 经济议题和安全议题之间的张力在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中都有所体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 但在安全领域却存在着战略互疑。布什在任时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 但与此同时, 中国加入了WTO, 而您当时正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界限?

Robert Zoellick: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问题, 也能为我们洞察政策制定过程提供帮助。我在2001年初开始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 时值中国入世谈判期间, 朱镕基前总理在中美双边协议问题上做了极大的努力。当时双边协议业已签订, 国会也批准通过了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但是多边规则的谈判进程尚在进程中。2001年, 中国在上海主持召开APEC会议, 我与国务委员杨洁篪(时任中国驻美大使)也在会议期间进行了谈判。当时正值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不久, 两国之间紧张骤增,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就达成贸易协定所做的努力。小布什前总统坚信撞机事件不应妨碍中国入世进程, 这反映了他力图将中国拉入国际体系的“融合”概念。下一个阶段则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即: 秉持国际体系的系统性视角, 帮助中国推进市场改革, 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 并将对体系理念拓展到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

吴心伯: 就我的理解, 2005、2006年同戴秉国进行战略对话的设想是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由美方提出的。当时发起战略对话的意图是什么?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生的演化?

Robert Zoellick: 我并不知道举行战略对话的设想最初来源于哪一方。在2005年进入国务院任职时, 我承继了在副部长级别举行高级对话或战略对话的理念。这一理念与我力图完成的工作非常契合, 因为在入世谈判圆满结束之后, 美国的对外政策缺乏必要的战略焦点。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外交部和国家发改委从未有过相互协作。戴秉国部长(2005-2007年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的个性与职位, 使得我们能够在双边对话中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换意见。这反映出在中美领导人之间举行冷静的、相互的战略对话的必要性, 正如六月份举行的习奥峰会那样。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 战略对话在两国的同级官员都愿意以密切的方式参与到战略层次的时候往往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 例如基辛格和周恩来、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等组合。对于超越对话层面、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塑造框架而言, 人的因素往往会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

吴心伯: 您提及习奥峰会。作为共和党一员, 您会如何评价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

Robert Zoellick: 政党分立是美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现象，但理解美国两党的内在连通性同样关键。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杰夫·拜德曾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我共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事务；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同样曾在当时和我共事；汤姆·多尼隆同我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一些在奥巴马政府中地位关键的对华政策顾问同曾在小布什政府中任职的人员关系密切。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时，就试图（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留意面子和尊重问题，但他的这种努力并未如愿被中国领导人感受到，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合作与尊重，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生的误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比如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和双边贸易关系上发生的摩擦等。结果，奥巴马被视为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强硬”。

“网络安全”问题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全方面危害，因为两国在该问题领域缺乏一项明智的政策框架。我们需要学者们的帮助，因为这一议题跨越了许多领域。军事间谍活动贯穿始终；商业间谍活动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并有可能转变为破坏活动和战争能力。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军事将领想要介入有关传统观念是否能够应用于网络领域的讨论，比如间接损害、热力追踪等。直到最近，中国政府依然不愿意同美方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在网络安全领域，中美关系的政治面临着—个危险因素，即：当对某一事物产生恐惧时，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进行妥善应对，最糟糕的惧怕情绪主导着他们混乱的思维。在一轮战略对话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协调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善加处理。我认为中美两国当下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即网络安全和朝鲜问题。

吴心伯: 您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益攸关方”—词。时至今日，随着国际影响增强和国家利益扩展，中国对其应该承担的地区和全球责任有了越发清醒的认知。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要求中国分担更多的责任。那么，这些国家又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和中国分享权力和声望呢？纵观2005年至今的美国对华政策思维，您认为这其中有什么演变吗？

Robert Zoellick: 在安全领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两国拥有一系列共同的全球利益：能源安全、

海上航道、全球反恐以及其他众多安全利益。中美关系的紧张更多是表现为地区性的。两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是防止地区紧张压倒全球合作，在全球问题上增进合作反过来又有助于引导对地区性问题进行调解。

在许多议题领域，（美国国内）都有与中国深化合作的相关讨论。如果中美两国同心协力，他们将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若不然，我们将在环境和气候变化、经济复苏、再平衡以及贸易体系等全球议题上举步维艰。我向世界银行引荐了林毅夫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国际金融公司的总裁和CFO都是中国人；朱民正在担任IMF的副总裁；我们都在鼓励美国与中国—道携手合作。

关于分享权力的要求，这又提出了—个问题：主权国家如何透过国际体系视角看待它们的国家利益？现存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是有利的。经济领域存在着许多合作性的权力共享和共同利益的例子。而在安全领域，我相信领海安全和通航自由是各国的共同利益，空间和资源开发也同样如此。（美国同中国）分享权力的意愿是切实存在的。但是，美国的主流观点也认为，中国在共同承担责任方面表现得不情不愿、犹豫不决。

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出发，对威胁的“认知”是共享性的或是互异性的，其间差别意义重大。比如，朝鲜的核武器及其挑衅行为是真实存在的威胁，但中国的战略考量认为（区域）不稳定的威胁来得更大。尽管如此，利益上的共通之处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朝鲜动用核武器，韩国、日本和美国将会以有损中国利益的方式做出回应。

中国和美国在经济议题上都表现得比较负责任。总的来讲，中美业已在经济领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尽管经贸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两国也应该确保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妥善的管理。相比之下，安全领域则缺乏这种广泛的联系网络，而这种情势是很危险的。

吴心伯: 在2010年，IMF通过了一项改革议程，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投票权的份额。截至目前美国国会依然没有批准同意。您认为此事在未来几年将会取得何种进展？

Robert Zoellick: （首先必须说明，）国会在这—议程的拖延并不是出于中国的原因。实际上，国会议员们对IMF和其他国际制度兴趣索然。尤其当他们试图控制预算的时候，更会对为什么应该付给IMF更多钱之类的问题

刨根问底。他们更多时候在质疑美国对国际制度的过度参与，而不是试图控制这些制度。

早些时候我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银行委员会会会讨论 IMF 的份额问题。有趣的是，其中一位议员问我，如果美国不缴纳更多的会费以增加其份额，其他国家则将获得更多的权力，他们是否会因此感到高兴？美国的淡出会令中国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国是否会对此喜闻乐见？我回答道，不排除个别中国人确实会乐见这种情况，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希望美国在这一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还有一点。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但以下情况同样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美国有很多人都在艰难地维持工作，支付账单，确保孩子们继续学业。他们都是普通大众，并没有支配世界的野心，而更喜欢待在国内安心生活。中国学者们在研究美国时，除了要同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和决策者们沟通，还应该尝试更广泛地关注美国的普通公民，如此才能切实感受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应对的问题。

这个观念与我走访中国乡村城镇的个人经历有很强的关联性。有些美国人以为中国意图统治全世界；而事实上，（我看到的）大部分中国人仅仅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见证了取得的巨大发展，在其中看到了个人发展的难得机遇，但也意识到了前方潜在的危险。他们并无统治世界的野心。

吴心伯：在您看来，“利益攸关方”和“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概念有何异同？

Robert Zoellick：“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中国领导层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西方的观念里，国际关系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5 世纪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这场大战的起源是“雅典实力的增强及其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即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我想中国领导人希望借此说明，大国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因此可以形成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一个非常有趣的理念。

至于这个概念与“利益攸关方”有何联系呢？这取决于领导人。我的看法是，建立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大国关系是可能的，但制定诸多细节将会非常困难。举个例子，中国计划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推进服务业增长，以便拓展

商业机会、拉动内需消费，一种可行的途径是引进外资企业，帮助中国塑造在物流、电讯、财务等领域都具备更强竞争力、更高生产力的服务业。这一举措将在促进服务业增长的同时，为两国创造共同经济机遇，消除部分经济摩擦。除了进行双边合作之外，中美双方还可以在 WTO 推动全球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这必将产生系统效应。国家议题或双边议题可以被纳入到有利于国际体系的框架内予以应对。

吴心伯：布什家族和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您认为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对中美关系和全球事务有何重要意义？

Robert Zoellick：私人关系有助于两国关系。他们不一定能够克服原则性分歧；但即便私人关系糟糕时，他们也并不必然会阻碍共同利益。在最低限度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有助于帮助人们了解对方的政治困难，可能还会为解决问题、管理风险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在内阁部长级别，领导人的个人态度会影响事态发展。有时候人们感觉贸易谈判是零和的逻辑。事实正相反，贸易谈判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解决问题的实践。理解对方的政治压力有助于谈判过程的推进。向对方表现出履行承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提出解决方案，更要令这些方案在自身所处的政治体制中切实生效。大国与小国相交之时，后者常感无助。而如果大国尝试着积极帮助小国解决问题，他们会心存感激。在任何官僚体制中，试图达成一件事都并不容易。重要的是，要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同时兼顾可操作性和细节问题。

吴心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您如何看待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潜力，尤其是相较于欧洲历史带来的积极的先例？

Robert Zoellick：“一体化”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数十年来，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两大学科围绕着区域体系和全球体系进行着经久不息的辩论。来自贸易领域的一个担忧是，区域集团的存在会妨害全球贸易体系。我一直认为上述危险是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担忧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区域一体化进程必然是在全球体系中发展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挑战之一是：如何在同整个全球体系保持联系的同时，从对区域性的、跨国界的议题的参与中获益。这是欧盟成功度过的历史，也是北美一定程度上正在亲历的难

题。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这一挑战在整个东亚地区逐渐加深。从消除各种经贸障碍、降低关税、贸易互惠等举措中,我们都能看到巨大的收益。与此同时,保持全球视角至关重要。我一直在严肃提醒美国政府,当他们推动 TPP 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时,应该同时注重与全球体系保持联系,而不能试图以区域性框架取代全球体系。

一体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为安全领域,(东亚国家间的)原则性分歧依然长期存在。东亚地区对“一体化”概念的解读与欧洲后现代的、国际化的理解差异显著。在本地区,19 世纪的(主权国家)模式相比 21 世纪的(一体化)模式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组织青年学生交流互动是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之一。德国对待二战历史的方式与日本明显不同,虽然我支持日本施行的民主体制,但日本政府处理历史问题不当的言行令人感到紧张。危险在于,甚至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已经为战争历史罪责付出了代价,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与亚洲其他国家人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作为一个崛起的、地区影响力蒸蒸日上的大国,中国必须谨言慎行。强国角色日益深入人心,令周边邻国紧张不安,中国极有可能将要面对 19 世纪主权国家的均势制衡反应。在我看来,东亚地区的紧张通常与历史记忆和敏感问题(如领土、领海争端)有关,仅为争夺自然资源而造成局势紧张,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后一个维度是美国的角色。美国在安全领域塑造了稳定的体系。尽管美国的政策并不完善,但中国必须承认,在东亚地区有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美国主导的安全稳定。如果中国被视为这种稳定局势的威胁,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好消息。很多事情都可以有效地帮助美国及其他国家来接受中国的新角色。美国在东亚地区确立的安全框架,部分源自二战之后的历史遗产,部分源于精心制定的地区政策。每个国家都必须格外小心这一框架遭受冲击,因为东亚地区明显不同于 21 世纪的欧洲,在该地区内,敏感和敌对的特征都更加显著。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能感受到智慧的冲击,不仅仅在经济议题上,也包括在其他众多议题领域。自 1980 年代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进程能否继续推进,取决于您这一代人是否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妥善处理敏感点和相应议题。关键之处在于,尽管挑战将接踵而至,中国仍将在国际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人而言,你们需要意识到这种角色必然造成其他

国家的紧张。中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意义重大的。德国人身处的一大困境是,自二战之后,德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便不被其他国家视为企图称霸欧洲。然而事实却是,德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实际上主导着欧洲。所以对于德国而言,如何实施事实上的主导,却又不以统治者形象示人,是个非常重大的难题。令德国的朋友们感到沮丧的是,他们一边在财政上资助其他国家,还一边在遭受来自这些国家的批评。(我想对中国说的是,)欢迎来承担起大国的角色。在一定时期之内,这将会是美国和中国承担的角色。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大国角色具有不同的意义。中华民族将帮助世界为未来奠定方向,这个大方向对中美两国、以致全球体系都至关重要。想象一下我们生长的历史时期、所处的广阔空间,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代机遇。

防治慢性病，亚洲需吸取西方教训

Michael Merson

杜克大学副校长、全球战略和项目副教务长

■ 采访者：傅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教授） / 编辑：黄欣怡



66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让你们的民众远离慢性疾病的威胁。

99

傅华：当我们提及防治NCD（慢性非传染病）时，吸烟导致的高患病率是我们优先讨论的。中国吸烟患病率很高，您认为对此我们该怎么做？

Michael Merson：我同意你的观点。防治NCD如今非常重要。现在的媒体非常关注禽流感、肺结核之类的病毒性疾病。这些确实是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但迄今为止数十亿亚洲人口的最大威胁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中风、糖尿病、癌症，以及精神健康问题。这是很大的挑战。

西方的一些国家在上个世纪已经遇到过并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惜的是，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在亚洲或中国得以应用，这点令我非常失望。看起来亚洲将经历同样的悲伤：很多人过早得病，过早死亡，无法享受长寿而快乐的人生。

导致慢性非传染病主要的两个危险因素是吸烟和饮食。关于饮食，当然是因为人们摄取脂肪太多，而摄取谷物和水果不足，以及摄取了过量的盐。摄取过量的盐分会导致严重的高血压和中风，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

关于烟草，我认为全球健康最大的威胁毫无疑问是烟草。有时候人们问世界上最流行的是什么？他们认为是艾滋病，但我认为是烟草的使用。2030年，将有近1亿8千万人死于烟草，其中大部分人来自中等收入国家。烟草是导致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当然也会导致呼吸道疾病和肺癌。而肺癌是中国人得的最多的癌症。

那该怎么做？新加坡和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作出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公约”就是一个这方面的全球性框架。但是，签署一份文件很容易，要履行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国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交税。高昂的税费抬高了烟草的价格。香烟价格提高，购买的人就会减少。而且我们更应该关注年轻人，因为烟草很容易上瘾，一旦上瘾，就很难戒除。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香烟的高价，并对从5岁一直到十几岁的年轻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就香烟的危害性进行教育。我知道人们吸烟还出于别的原因：有的人有太多的压力需要释放，女性借由抽烟来减肥等。但吸烟对他们今后生活产生的后果却非常严重，所以我们需要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吸烟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他们的需求。例如，人们可以通过运动和休假来减压，女性如果担心自己体重的话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减肥。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政府多方面支持比单一的卫生系统更重要。我们需要教育系统、财政部门、贸易行业，包括中央和省市在内的各级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和通力合作。因为各级各部门的决策都对吸烟有着重要影响，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当然，我们还要激励种植烟草的农民改种其他作物。这样的政策应该由省市级政府发布，来鼓励农民种植其他能够有同样多收益的作物。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好日子，因此你不能只是让农民停止种植烟草，而要为他们提供其他的激励。

傅华：你提到烟草和饮食是两个影响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健康的因素是缺乏锻炼。对于烟草问题，你认为需要政策和多部门合作来解决。那么对于饮食问题和缺乏锻炼的问题，你认为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Michael Merson：同样我们还是需要制定合适的政策。在饮食方面，我们要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意识到通过健康饮食获得长寿而美好的人生的重要性。也许我们可以请大众名人来推广健康饮食的理念。我们也需要将政策落实到位，以帮助人民实现健康饮食。例如，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怎样的食物？学校应该只提供健康的食物，而不是汽水之类的。因为孩子们会从碳酸饮料和糖水饮料中摄取过多的卡路里。我们还可以和食品企业商谈，请速食企业使用健康的油（来加工），以减少食物尤其是提供给孩子们的食物中的卡路里。如果这些企业主动这么做当然很好，否则我们也许不得不依靠相关的政策来推动他们这么做。

至于盐，我们要考虑如何让人们减少摄取量。我们可以让家庭使用量勺，或者用可以替代的更健康的成分。我知道这味道并不太一样，但如果人们从小就开始尝试的话，他们会渐渐习惯的。

所以，实现健康饮食需要采取多部门结合的方法。我们既要教育大众，也需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甚至还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在纽约市，所有餐馆的菜单上都要写明你所点的菜肴的卡路里。这是个非常好的宣传，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意识到饮食问题。

关于体育锻炼，3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大街上看不到汽车，每个人都骑自行车，人人都在打太极，早

晨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打太极的人。但现在我走在大街上，看到的是宝马、丰田、起亚，而不太看得到自行车，也不太看得到打太极的人了。在街头我也找不到体育锻炼设施，而在美国，健身设施随处可见，即使是在工作场所也有着健身设施。所有的工厂、公司和学校都应该备有足够的健身设施供人们锻炼、休息和运动之后进行淋浴。学校也需要设置体育锻炼项目，这应该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这样所有的年轻人就都能得以锻炼了。每个成年人每天至少应该运动30分钟，每天行走八千步。这是个很好的目标，是可行的。我们应该让公众自发要求这样的改变，这样政策制定者就会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请求。

同样，我们应该获得私营企业的合作，而非反对。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可以做更多的推广，所以我们需要他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并让他们知道，使公众变得健康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傅华：卫生系统在慢性非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方面能做些什么？

Michael Merson：不幸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目前的卫生系统只有在人们得了非传染性疾病后才会发生作用，可是我认为卫生系统也可以在预防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当年轻人接种疫苗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准妈妈来做产检时，就可以借机向他们灌输不要吸烟、要健康饮食、健康生活等理念。当然预防上也存在困难，大多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都有很长的潜伏期，人们无法很快看到预防的好处和疗效。但我们要让人们信任医疗保健工作者，同时，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必须把教育民众作为他们的日常职责。

在中国，很多人都有高血压，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会采取减少摄取的盐分、利尿或其他更强的措施来降压，所以卫生部门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人们对此进行预防。例如阿司匹林能有效防止高风险疾病者的心脏病发作。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家族有心脏病史，并且属于患病的高危人群，你可以每天服用一片阿司匹林来降低风险。所以我认为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卫生部门也应该对此有更多的考虑。如果人们患病了，比如高血压、中风、心脏病发作、心绞痛或癌症，我们应该确保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看护，并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病情。如何活得更加健康，如何防止他们的慢性病进一步恶化，人们需要这方面的教育。

傅华: 我们的论坛着眼亚洲, 因为亚洲是全球经济最热的地区。心理健康问题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主要威胁, 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重点之一。你怎么看待心理健康和慢性非传染病的预防问题?

Michael Merson: 你说得很对。亚洲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中国正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也许很快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了。我想也许这一切发生得太迅速以至于人们忽略了社会层面的其他问题, 人们觉得经济是无敌的, 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强大的经济来改变。

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变化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社会的急剧变化, 更多的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 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以至于政策制定者们无法迅速地对这些变化产生的后果进行应对。但这不能拖延, 拖延得越久, 后果就会越严重。

现在饮酒(过量)也是一种危害。少量饮酒有利于预防心脏病, 但我们不应夸大这方面的效果。适量饮酒是可以接受的, 但过量就会有害健康。饮酒过量的人容易患上肝脏疾病, 特别是脂肪肝。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知识普及给市民, 并制定相关的严格的规定。例如, 我知道在中国对酒驾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这很好, 而且必须要强制执行。最近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 我注意到晚餐里的茅台酒变少了, 饮酒也没有那么疯狂了, 我想这是很健康的, 政府在控制适量饮酒方面做得很正确。

饮酒过量反应了现代人所承受的压力。那么有没有其他途径来释放压力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求用人单位制定一些政策, 例如人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有休息时间, 要让员工做更多的运动, 并且他们的休假要得到保证。如果我们能建立起这样的机制, 即人们随时可以纾解压力, 人们就会感到更加的舒适。

中国有一种竞争文化。我认识一些来到美国读书的学生, 他们在每场考试中都努力竞争, 而这种竞争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除了考试以外, 有没有其他途径让年轻人展示他们的优秀? 有没有其他方法让他们在没有那么压力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的目标? 因为我认为青春期早期的压力不会消退, 它会一直延伸到成人阶段, 并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傅华: 我认为您的观点和评价很有帮助, 非常感谢!

Michael Merson: 谢谢。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 你们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 让你们的民众远离慢性疾病的威胁。

中国在全球污染问题上可能是领跑者

Andreas Löschel

德国能源转型监督专家委员会主席，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环境与资源经济及环境管理所所长、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 采访者：吴力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编辑：Silvan Griffith



66

我一直坚信这将是未来技术的方向，德国可能不会成为最先应用的国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鉴于目前污染的全球性质，我认为，最好是由中国成为领跑者。

99

吴力波：请您能否简短介绍您作为德国政府能源转型监督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的职责？以及描述一下该委员会的功能？

Andreas Löschel：德国政府已经设置了长期目标，期望在 2050 年实现能源系统的彻底转型，这一目标以及整个转型都来源于 2007 年启动的一项能源计划。在这一能源计划中，德国政府不仅展望了新能源系统（预计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的前景，更表示这一转型将严格遵循监督流程——这种监控是有科学依据的，时刻关注德国是否在目标轨道上，一旦发生偏离还将指导政府及时调整以实现长期目标。监督主要包括两个职能，一个是让政府部门每年发布监测报告，公布约 50 个指标来综合衡量能源转型方面的完成情况，包括能源安全、企业和家庭能源成本等。

吴力波：在即将发布的报告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Andreas Löschel：我们总是在尝试推进新的想法，我们仔细浏览每一个相关领域，从各个角度观察在能源转型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和仍存在的问题，例如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等。我认为目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着眼于可再生能源，沿着很好的轨道逐步实现既定目标；关注能源安全，发现德国正在面临装机容量问题；关心能源成本，虽然目前整体处于可接受的水平，但是我们也发现，调控已经造成部分成本增加。最后关于整个欧洲方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可以发现目前该体系对德国能源转型促进不大，因为交易价格过低，导致德国工业企业投资低碳科技的激励不足。

关于能源系统转型，我认为最关键的挑战之一是淘汰核能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可再生能源领域有了比之前若干年份更快的发展，而且化石燃料开始有了诸多的竞争对手。但这不是唯一的挑战，我们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实现，这与最终的转型是协调一致的。淘汰核能这一步虽然是能源转型中最重要也是最受关注的一部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有众多的其他目标，如改善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等——这也使得淘汰核能逐步变得可能。我们希望在 2050 年在德国建立一个几乎无碳的建筑行业，这对建筑业将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吴力波：（无碳建筑）是否将采用太阳能支持？

Andreas Löschel: 主要是在供暖方面采用可再生能源,用保温等措施来实现无碳建筑。但是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我们不光要注意目前新建的建筑,更需要长期涉及所有德国的建筑物。这是非常有野心的目标,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对成功转型非常重要。如果你想问可再生能源地位如何,我会直接回答你,可再生能源确实能够促进对核能的替代,但是它们只在一定程度上有帮助(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有中间可再生资源),目前我们仍然需要传统的能源。

吴力波: 据我们所知,美国最近的页岩气实验非常成功,对新兴经济体实现能源独立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奥巴马总统也试图通过该计划来推行美国“再工业化”。你对于这样的能源独立战略怎么看?

Andreas Losechel: 这是问题在德国也讨论激烈。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许多德国公司正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一方面,我认为需要考虑到目前竞争的劣势其实与能源转型联系并不紧密,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页岩气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地方的繁荣确实使德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但从根本上说其实并不是能源转型导致这一成本劣势。事实上,德国政府对其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问题心知肚明,这是一个从发展中需要学到的经验教训,我们并不打算在德国来一次“页岩气革命”,德国对此比较谨慎,希望能再等待一段时间直到该技术进一步成熟,所以德国大规模使用页岩气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德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帮助国内的工业企业避免落入这样一种不利的价格竞争情况,虽然并不能够完全补偿损失,但是政府已经采取一些可能的行动,例如电价补贴、调低电网费用等,这是一个积极应对。

吴力波: 您刚才提到了电价补贴,在中国,太阳能和风能领域也有类似的补贴。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考虑是否需要一个更加自由灵活的可再生能源交易系统。所以哪种政策对于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加有效?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

Andreas Losechel: 我认为,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最近几年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例如去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已经达到23%,而且以很快的趋势增长。在这方面,有效率是指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非常有吸引力,也就是给投资者足够的激励,这也是我们在风能反面取得很快发展的原因。一方面,

这导致了过去几年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降低,规模经济和科技发展使得光伏发电的成本从40美分下降到不足20美分,并且还在变得更便宜,这是这种政策带来的好处之一,德国事实上是在实践全球“学习曲线”。另一方面,这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政策,因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政府补贴支出也迅速增加,在最近一年,我们花费了大概200亿欧元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这部分资金事实上是从消费者、家庭和企业而来,其实是消费者自己支付了电费账单。在去年,该笔费用也增加了,从3.5美分每千瓦时涨至2012年的5.3美分每千瓦时。

事实上,这是欧洲第二高的电价,仅排在丹麦之后。所以改革是否必要正在激烈讨论,因为我们感受到固定了20年的上网电价补贴、新能源补贴使得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者免除了一切投资风险,这急需改变。补贴政策对新能源产生到占领大约20%的市场阶段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它却不是我们下一步——达到80%市场——时所理想的政策模板。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才刚刚开始,今天我们有大选,直到9月底新政府被选举后才会开始对可再生能源系统进行改革,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深刻的改革,进一步整合可再生能源市场,并且在未来诞生一个市场导向的、更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体系。

吴力波: 您刚才提到了选举,那么我想请问,您对此种长期的绿色政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如何看待?

Andreas Losechel: 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当然存在,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不断调整前进道路。我们不知道最终该如何朝着目标前进,这意味着我们要灵活机动,随时关注政策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对能源安全是否有贡献等。政策上的不确定性的确实增加了这方面的困难,因为新政府对于如何平衡不同的目标有自己的看法。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转型的总体思路在德国得到了两党共同的支持,所以尽管可能在关注重点和某些具体实施措施上会有争议,但是总体思路是得到各方肯定和支持的。所以,我不认为今年的选举会导致德国年底出台完全不同的能源政策,一些调整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希望确保这一能源转型是以一种经济上高效的方式完成,不会对家庭和工业造成太多的负担——不然这将对转型造成阻碍。并我们必须说明这项转型对德国人民有好处,并且将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进行,不会在实现长期目标的过程上浪费太多资源。

吴力波: 为什么德国到目前为止还没能淘汰褐煤的使

用？是因为德国自身是最大的生产者么？

Andreas Losechel: 如果你去看德国的电力系统，你就会发现煤炭的地位很重要。在德国，大约有 45% 电能是由煤炭发电的，这一情况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煤炭是过去乃至现在德国电力系统的基础。确实，它像你所说的，是一种对环境有危害、会造成污染的发电方式，尤其是褐煤。但是在欧洲，我们有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控制燃烧煤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目前该系统中排放许可的价格很低，仅仅是大约 5 欧元每吨二氧化碳，这使得将发电完全由褐煤转换到天然气方式目前是实现不了的，或者说不经济的。天然气的价格不断上涨，煤炭的价格在不断下跌，再加上二氧化碳的排放交易价格很低，三点共同造成了德国目前继续大量使用煤炭发电的局面。

我认为德国人并不十分担忧本地的空气污染，这个话题不是讨论的核心和重点，因为有很多环保法规来处理当地的空气污染。例如，我们在曼海姆 (Mannheim) 有一个很大的煤炭发电厂，当地人也并不抗拒新建一个这样的发电厂，因为他们相信空气污染问题已经被政府纳入考虑。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全球污染问题，去年的数据也显示，煤炭的使用有所增加。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主要“利器”是排放交易系统，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规则来应对空气污染，除此之外，我们并不打算采取任何（调控）措施来主动淘汰煤炭发电，而是让市场来处理剩下的一切，而目前为止，我们的市场“工具”价格还不够高，不足以完成对煤炭的淘汰。我估计，当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上涨到 20 欧元左右的时候，煤炭发电将会自然的被市场淘汰。德国拥有世界上第五大的褐煤储量，所以从目前看来褐煤资源非常有竞争力。尽管我们对于二氧化碳的目标很明确（并且朝着该目标奋斗），但是一旦碳排放交易系统无效或者关闭，人们会立刻重新大量使用煤炭。

吴力波: 也许在那个时候，碳捕获和封存技术 (CCS) 的成本会更加降低？

Andreas Losechel: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页岩气，最近一些年来，有相当一部分关注这方面技术的德国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反对页岩气、碳捕获技术 (CCS)。所以我们停止了大多数在德国的示范工程，对此我很遗憾，正如你所说的，这可能是未来的领先技术。我一直坚信这将是未来技术的前进方向，可能德国

不会成为首先应用的国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鉴于目前污染的全球性质（和中国煤炭的使用情况），我认为，最好是由中国成为领跑者。很明显，中国的煤炭使用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低效率的煤炭发电厂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等。我认为，德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是指德国的煤炭发电厂效率很高，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对于环境影响较小，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中国自己更加关注。在我们德国，主要需要讨论的碳排放交易系统 (ETS) 的一些问题，我们不会采用直接对煤电厂的干预的手段，德国与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

吴力波: 那接下来谈谈关于德国在非洲北部开展的能源战略，德国已经开始了使用沙漠太阳能发电项目 (DESERTEC) 将电能从沙漠地区传递到欧洲？您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Andreas Losechel: 沙漠太阳能发电项目 (DESERTEC) 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德国工业项目，原本的想法是，我们需要从那些比德国本土有更加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的地区获得一些能源供应，比如非洲北部。正如你所说的，这一项目在 2009 年启动，目前项目的热度已经在衰退，远远比不上几年前，但是仍然在继续。在我看来，沙漠太阳能发电项目应该改换角度继续发展，关注点不再是向德国传送电能——传输本身很困难，高压输电线需要穿过西班牙、法国才能到达德国——而是作为一个促进非洲北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不需要过多的向德国提供电力，而是给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提供可再生能源。我认为，这是改变的方向，尽管许多公司已经开始退出这一项目，我相信它不会完全停止，而是转换重点来支持非洲国家的能源发展，这是德国工业可以做出的一项贡献，即为沙漠国家提供可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吴力波: 我们都知道，资源分布是很不均匀的，那么这是否会导致对清洁能源形成类似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未来清洁能源是否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Andreas Losechel: 目前在欧洲，每一个成员国都有独立的支持系统。当然，我们很清楚发电资源在欧洲是分布不均的，例如欧洲南部的太阳能、北部的风能，西北部的风能等都很突出。但是在目前，我们还没充分利用这些发电资源。一个很好的提议是建一个全欧洲的可再生能源支持系统，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些资源，比如

在西北发展更多的风电、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展更多的水电、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开发更多的太阳能，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缺乏的。比如德国，它并不是欧洲阳光最充足的国家，但是它是欧洲最的光伏发电用户，这就是没有效率的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在欧洲开发一个更高效的系统，实现统一的欧洲能源和安全市场，在长期这不会导致能源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将会有一个统一的电能市场并将大大改善不同成员国之间的电网分布，然后你就可以想象，这些在欧洲分布不均的可再生资源将会更好的被利用。但是目前我们还不会这样做，因为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来长距离传输可再生资源，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类似的计划已经有了，因为德国内部同样存在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大多数德国电力消费者在南部，而大部分风能集中在北部，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或者增加北部的风电产能，正需要克服长距离传输问题，因此，我们开发了新的 HVTC 网络，这将有助于长距离而不会造成过多的能量损失，这种科技同样可以被用于在欧洲内部来更好地利用各种资源。

吴力波： 这不是一种浪漫主义？

Andreas Losechel： 我不会把它称作浪漫主义，因为这是最终我们要面临的严峻的长期挑战，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长期挑战。正如你所知道的，为了实现长期的利益，需要面对短期的损失，所有国家的政府都需要选择是否愿意付出短期的代价来改善长期局面，我认为德国政府非常清楚它有责任解决这些长期问题，并且也在积极尝试。它不应该愚蠢的行事，我们非常明确一点，那就是需要确保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因为这些环境政策而受到过多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德国作为主要工业化国家之一，需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并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努力抓住机遇转化为长期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欧洲资源稀缺，气候问题在未来会更加恶化，这是长期且真实存在的挑战。我们试图在能源效率和资源效率方面成为领跑者，因为我们坚信长期会有更大的挑战，因为要确保走在前沿，不至于落后它国。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们在朝着这个长远目标努力的过程中需要审慎查看，确保这些政策不给家庭和企业造成过大的短期困难，这是一直需要平衡的问题。

吴力波：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那么类似欧洲碳排放体系的交易系统是否正是这样一个和谐的利用市场参与者的多样性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好方法？

Andreas Losechel：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试图找到最便宜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式。但是你必须考虑到，一方面这是试图找到最有效的减小排放的方式，另一方面，该体系需要在不同的成员国之间分配负担，因此，这个系统是为了协调利益和成本而存在，不同的成员国拥有不同的排放配额和比重。目前这个体系主要是用拍卖方式来配置排放配额，拍卖的收入将被分配到各个成员国，分配时会综合考虑到各国负担情况、经济条件、政策环境等，所以我们期待通过这个系统来达成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但是同时也会尽量平衡由于该方案造成的负担，即通过成员国全体同意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拍卖收入。从碳排放交易系统成立至今，我们已经位于了第三阶段（从 2013 年开始），为此，我们制定了新的规则来分配利益，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一种不同成员国间共同承担负担的经济方式。

吴力波： 但是您刚才提到，二氧化碳的排放价格目前还很低廉，因此难以推动从煤炭到天然气的改革？

Andreas Losechel： 价格确实很低，但是我们需要考虑为什么它如此低，这其实反映了 2009 年经济危机对欧洲的巨大冲击，它使得企业对排放许可的需求大大降低，因此排放许可在市场上供给过量，这也是我们学习到的一点——排放交易体系需要更好的抵御经济危机造成的波动。另一个原因是企业通过灵活的机制来到了欧盟之外的廉价许可，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的决定 ETS 系统中到底需要多少排放许可。第三个原因是，许多行业得到了免费的许可。基于当前不景气的经济情况，我们给出了很多免费配额，有些企业得到了比他们实际需要的更多的排放配额，所以甚至可以通过出售配额来牟利。我们现在讨论的 2030 年的目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等方面）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还需要给出免费的目标以及如何严格的制定。我认为，我们应当综合考虑所有情况（尤 2020 年至 2030 年间），制定远大的目标，向投资者展示，尽管目前的价格低廉，但长期目标终将实现，所以在今天投资碳排放技术将会带来美好的回报。必须注意到，这都是长期投资，需要 20 年以上的时间来成熟，因此吸引投资者必须使他们清晰的看到接下来几年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通过定好目标规划来吸引更多的投资。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迅速在这方面展开行动，及早订立有野心的目标，并认真思索和解决碳排放系统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世界金融体系正逐渐趋于多元化

Hélène Rey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学院院士。2012年她获得了由欧洲经济学会颁发的首个 Birgit Grodal 奖，该奖项旨在表彰为经济学作出突出贡献的欧洲女性经济学家。2013年，她与 Thomas Piketty 一起获得了 Yrjö Jahnsson 奖。

■ 采访者：林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编辑：Silvan Griffith



66

如果要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话，必须至少同时建立一个全面的银行联盟

99

林曙：您做了很多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那么在您看来，现行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Hélène Rey：在我看来，现行体制导致了储备的过度积累。你可以从利率角度来看储备（过度）积累的影响。众所周知，利率在逐渐下行，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因为利率非常低，你就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对一个国家来讲，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用预防性储蓄来代替储备。如果不能通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来建立预防性储蓄，那同中国类似，你的防守线就是积累外国资产。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最后贷款人，一个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就不需要积攒很多的预防性储蓄。相反，你可以增加信用额度。在我与 Emmanuel Farhi 和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共同完成一篇报告中，我们提出要增加可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资源数量，以允许其直接在市场上借入资金。因此，在发生危机时，个人可以从 IMF 借款，国家可以从 IMF 借款，从而以更正式的方式建立起货币互换协议体系。货币互换协议体系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高峰期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在解决美元短缺问题时起了很大作用。但它确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做事方式，为建立起更有效的防御屏障，我们建议将其规范化一点。

林曙：我注意到您提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叫做新特里芬难题。由于您认为这是引发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原因之一，能不能请您再详细阐述一下？

Hélène Rey：我不确定它是否是引发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我肯定会详细地讲述一下我们所谓的新特里芬难题。转化成黄金，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美元转换成一定量的黄金。但后来，外界对美元的需求非常大，在美国之外美元的流动性非常高，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所有外部的美元都能以固定汇率有效地转化成黄金，而这仅仅是因为黄金储备的增长并没有外界对美元需求的增长那么迅速。所以在某一时刻你必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能把他们拥有的美元都转化成黄金。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某种挤兑，对美元的挤兑。如果我现在有美元，我就希望把它转化成黄金，因为如果一直等下去，我就可能拿不到黄金了，对吧？这是就特里芬难题背后的思想。

我们从中学到的一点是,类似的问题在当今也会出现,它现在就出现了。但显然地,问题并不在于美元不再由黄金支撑了,而是是什么决定了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的价值,所以它与之前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国债的价值是由美国的财政能力决定的,也就是美国财政部兑现美国国债的能力。目前,大部分美国国债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如果你认为,由于美国之外的国家有时会比美国增长地更快,因此对美国流动性、对美国国债需求的增长也非常迅速的话,那么总有一天美国会积累大量的外部负债——我们并不是指净值,而是总值——大批的外部债务、外部政府债券都是以美国的财政能力作为有效支持的。但同时,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美国(经济)的规模,美国的财政能力,大概都是在下降的,因此,总有一天人们会再次提出这个合理的问题:美国的财政实力是否足以支持所有的外国流动性。那时,各国都会想在美元流动性之外增加一点多元性,寻求不同种类的货币作为流动资产。看得再远一点,我们会好奇哪个国家能真正地发行国际货币。如果我们抛弃美元,谁将会取代它?这是一个显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回顾历史,总是世界大国、大经济体或者大贸易国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当英国是世界经济领导者和国际贸易强国时,英镑是国际货币;而当美国逐渐强大起来,并且实际上比英国更加强盛时,就交易量来讲,当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时,我们便转向了美元。所以展望未来,就经济总量而言,一方面我们有欧盟,但它存在治理问题需要克服,另一方面,还有中国。然而,为了发行国际货币,你必须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资本账户和一些类似的条件。

林曙: 您提到经济规模非常重要,但我知道您有一篇论文是关于贸易作用的。在那篇文章中,您指出就国际货币的角度而言,贸易金融中心比经济规模更重要。

Hélène Rey: 对的。但通常来讲,重要的是贸易流的规模,而且一般来说,你必须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才能有大的贸易流。所以它们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但如果我们再次回顾英国的历史,它是第一个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它曾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它也曾是英联邦国家最大的贸易国,所以进进出出英国的贸易流非常大;之后美国成为了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在国际商品服务市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尽管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卢森堡的货币非常稳定,但我们仍然不能想象像卢森堡这样大小的国家能发行国际货币。

林曙: 您是否认为世界金融体系正逐渐走向多极化或者全世界将会使用统一的货币呢?您认为哪种情形更为现实?

Hélène Rey: 我确实认为存在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而这无非是因为相对经济规模在发生变化。无论是从GDP、贸易还是仅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亚洲的比例都在逐渐增加。如果历史可以提供任何借鉴的话,正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经济变量正在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转移。当英国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经济体逐渐缩小时,在一段时间内,英镑仍保持了其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同时特别是,即使英国经济体与美国经济体规模相比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伦敦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所以存在惯性。当你成为一个重要货币时,很多人都在使用,极少有动机来偏离这一均衡。如果你是唯一一个决定明天用人民币来交易的人的话,这对你来说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因为你必须找到一个交易对象。然而,其他人都在使用美元,所以找一个用美元交易的人会比较容易很多,那么你就有动力作出改变。在不同的体系间存在很多惯性,因此实际经济规模、GDP、人口数量、贸易流等的变动与转向另一货币的金融变革间会存在时间差。我们从英镑向美元的转变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GDP、贸易流确实是在向亚洲转移,但资金流还没有转向。如果历史可以提供任何借鉴的话,这一过程将花费一定时间。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资本市场发展欠火候的国家。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我认为趋势确实是趋于多极化的。

林曙: 我们对人民币如何成为国际货币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上海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金融中心,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而是像纽约、伦敦一样,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那什么是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主要决定因素?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Hélène Rey: 首先,为了让你的货币能更广泛地被大家使用,你必须取消对货币兑换的很多限制。在我看来,尤其是对投资组合/投资的资金流仍有很多限制。所以首要的事情之一是增加货币的自由交易。当然这一过程一定要小心,因为你不希望出现大规模投资组合的资金流动以及在未对冲的情况下,出现剧烈波动。所以要对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做仔细研究,当然,同时监管环境也

要进一步完善，以确保安全性。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逐渐累积起来，同时你需要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源，会有很多的聚集效应。为了建立金融中心，你需要积累很多诀窍。

林曙：关于资本账户开放这个问题，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讲，他们了解到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因此他们想开放自己的资本账户，但同时他们也担心如何保护本国货币不受资本流动的冲击。为保证既能享受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又避免危机的产生，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Hélène Rey：这显然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也是国际经济中的一个大问题。看起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确实已经失去了活力，而且不仅是新兴市场国家，一些欧元区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譬如西班牙、爱尔兰的资本流入，它们的周期性非常强，而且极不稳定。如果不对某个特定的信贷资金流动或者热钱流动或者短期资金流动进行核查的话，资本的自由流动很可能会带来一个资本流动热潮。资金会从金融体系中溢出，并最终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如果产生了房地产价格泡沫，事情就非常严重了，你会遭遇极具破坏性的危机，它可能会毁了整个金融系统。所以这些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在很多危机中，我们都经历了这种资金流的强周期性波动，我想最近的一次就是欧元区危机了吧。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资本自由流动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尤其是针对有时比FDI资本流周期性更强的信贷资金而言。那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应该集中一系列政策工具，并根据它们的目标或者作用，将其划分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资本控制政策。你可以在考虑一国市场特征的前提下，用这些政策来削弱资本流动的周期性。尤其在房地产市场要非常小心。通常在国内市场中存在资本流动扭曲，例如房地产企业的子公司。在很多国家，房地产投资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当有大量资金从国外涌入时，这些子公司会通过新增贷款的方式制造出资产泡沫。因此，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一定要解散这些子公司，并作出一些会计调整，调整贷款价值比（LTV），调整债务收入比，注意贷款标准。在微观层面要密切关注银行监管问题，在宏观层面关注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为确保周期性并不那么强，在宏观层面，我们可能希望有额外的资本可以用来缓冲、增加资本金要求。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在尝试这些政策工具，我想关于如何

使用这些工具，我们可以多了解一点。

林曙：看上去，仔细监控和建立某种审慎机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您之前提到全球GDP在发展转移，其中心在逐渐从西方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众所周知，欧洲国家的经济融合度非常高，但亚洲国家的融合度相对较低。您认为亚洲国家是够应该追随欧洲的步伐，模仿它们几十年前的措施呢？

Hélène Rey：经济融合的过程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欧洲国家试着建立一个商品服务共同市场，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步。随之产生的是监管问题，这在欧洲确实非常有挑战性，在亚洲可能也一样。但在考虑建立货币联盟之前，迈出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你已经迈出了那一步——设法建立一体化市场，如果你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创立共同货币是完成地区一体化可行的方法，同时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来看，这可能也是一个理想的情形。我认为欧洲一体化经验教给我们重要一课：如果要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话，必须至少同时建立一个全面的银行联盟。因为至少对欧洲金融体系来讲银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银行市值是一国GDP数倍的话，在银行业风险和主权风险间将会存在一种关系，在危机中，这一关系被证明是致命的。打破这种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一个全面的银行联盟，最终使得银行的规模，与整个地区的经济总量相比相对较小，而不是像爱尔兰银行一样，是爱尔兰GDP的数倍。事实上，当爱尔兰银行破产时，整个爱尔兰也随之破产了，银行与国家同时破产。冰岛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本质上讲，西班牙也是。所以这是重要的一课，应该在亚洲金融体系中有应用。这是欧洲人学到的东西。

林曙：这个观点非常有趣。我听说很多人都认为财政联盟很重要，您认为有必要（建立财政联盟）吗？

Hélène Rey：无论我觉得财政联盟本身是否可取，我确实认为它对一个有活力的货币联盟而言，是必需的，而我恰巧认为财政联盟本身也是可取的。但我认为银行联盟对货币联盟来说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银行联盟，货币联盟最终会变得不稳定。然而请注意，在银行联盟中，你确实要共享一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至少需要有一定量可供使用的、由共同资金组成的共同重组基金。如果大型银行破产的话，你要有能力对这些银行进行重组，在出

现问题时，要能获取财政支持，所以你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但你并不需要一个完全成熟的财政联盟。我认为这使得整个过程在政治上更加可行。财政联盟要求所有成员国都有政治意愿放弃很多主权，我认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虽然它很理想，但目前看还确实不可行，银行联盟则可能是可行的。

林曙：欧元区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Hélène Rey：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将会采取的政治措施。目前情况已经得到了稳定，接下来就看欧元区国家怎么为他们的经济增添活力了。他们可以实施更多的改革，采用更为协调的财政政策，放宽财政紧缩，增加总需求，如果可能的话，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欧盟层面，还可以增加欧洲预算。所以确实还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些措施。

林曙：您能再详细阐述一下货币政策吗？

Hélène Rey：我们经历了一个从推迟到悬而不决，再到维持的过程，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措施。其中之一是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这对银行系统有利。第二个重要的措施是欧洲央行宣布启动直接货币交易（OMP），它有效地稳定了一些外围债券市场中的利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尤其是 OMT，它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好的传导机制，但目前就扩张性货币政策而言，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些都是真正具有局定性的措施。

关于货币政策，我注意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增长与通胀间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在各主要的经济体中，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从 9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联系似乎消失了。

我自己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我想指出的是，货币周转率的下降、货币增长与通胀之间关系的破裂都是我们在大萧条时期曾观察到的。1933 年，《计量经济学》杂志发表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大萧条的所有特征，他提供了精确的图表，并指出货币增长与通胀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这是因为人们大多以现金和预防性储蓄的形式持有货币。货币出现在了商业银行或者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但却完全没有注入实体经济。

所以没有信贷增长，你可以说存在信贷紧缩。这就是大萧条，在目前的情景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状况。这已经被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阐述地非常清楚了，在谈论日本问题时也提及过。这就是流动性陷阱，人们大量持有现金。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它们却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没有通货膨胀，事实上，存在温和的通货紧缩。

上海论坛（2013）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部分代表于会后致信组委会，表达对论坛组织工作的感谢、对相关议题的延伸思考，及对论坛未来发展的期望。



Robert A. Mund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开幕式主旨演讲嘉宾

“我认为这次的论坛非常有意思。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就不同的主题做了多元化的演讲，从中我得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论坛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全面地展示出了许多内容。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论坛。从那些演讲中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具备相当高的研究水平，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浏览报刊头条，而是更深入地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和原因。我认为论坛的主办方在演讲嘉宾及话题的选择上是十分正确和明智的。”

Robert Zoellick

第十一任世界银行集团总裁；
开幕式主旨演讲嘉宾

“我认为这次论坛非常完美。来自亚洲各国及世界各地的嘉宾更使得本次论坛更为丰富和充实。同时，论坛也展现了上海以及复旦的卓越风采。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的合作同样非常有意义，我相信这次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中韩两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因此我非常期待明年论坛的举办，下届论坛也一定会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当年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与议题。

最后还要诚挚地赞扬本次论坛主办方的辛勤努力和工作。”

Alessandra Guariglia

伯明翰大学经济系主任；
世经分论坛嘉宾

“我很享受此次的上海论坛之行，也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上海论坛，我认为这次的论坛从各方面来看都安排得非常完美。”

叶兆辉

香港大学社会行政学系教授；
城市分论坛嘉宾

叶兆辉在《明报》上发表了题为《上海论坛的反思创新和进步》的文章，提到本届上海论坛有了更为丰富的题材，并着重介绍了他所参加的城市分论坛探讨的主题和学者们在交流中闪耀出的思想火花：

“早前笔者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上海论坛，3天的论坛有不同的题材，例如国家安全、金融风暴、城市建设等题目。笔者参与了亚洲城市发展的专题讨论，目的是探讨亚洲城市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塑造发展的新动力。有50多位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我们交流了不同国家和城市创新领域的实践、如何理解和实施城市创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理论。

当中发现，在亚洲不同地区都需要按本身的情况和本土特质不断发展，重要的是不断创新和进步来面对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创新所涉及的范畴不单是产业技能的提升，更要在管理和规划上不断反思和推进。为的是建造一个满足各种人口和社会发展、改善居民居住生活环境、营造一个高质量的城市生活。中国城市的发展，根据复旦大学任远教授的讨论，现在不单止

讲求什么形象工程，更需要深化建设和改革，也依靠由下到上的个人自发实践。上海近几年急速发展，无论硬件和软件都不断改善。现在很多生活上的需要都有手机应用程序（Apps）的应用，他们已有声音控制的出租车电召服务，还有不少生活 Apps 的运用，香港在智能化的应用确实有点落后。”

李碧建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参赞；
政治分论坛嘉宾

“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亚洲智慧——解决纷争之道”各议题的讨论，亲历了各种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听取了许多解决纷争的新看法和对策建议，可谓收获颇多。尤其是自己十分荣幸主持了中日关系的专场讨论，发现双方学界的看法和立场相去甚远，要弥合尚需时日，且考验我们智库的智慧和卓见。但正如我在结束讨论总结发言所说，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无法选择，中日互为近邻，必须学会如何和平相处。尽管观点差异巨大，但只要两国学者能够坐到一起交流看法，这就是希望和成功之所在。这次论坛对自己今后所做的相关工作将产生重大推进作用。”

上海论坛（2013）年会期间，组委会每日发布分论坛会议简报，并在此基础上，摘录、编辑代表观点，于闭幕式前汇总成《分论坛观点集萃》，即时报道论坛最新研讨成果。本刊撷取部分代表观点，以飨读者。

01
观点**Tae Yong AHN**

韩国法务法人正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法律分论坛嘉宾

亚洲合同法及其法律原则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年间，全球存在经济过热发展和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此时东方的智慧以及东方道德观就变得尤其重要。参与PCAL发现的两个重要问题，方法论的问题和价值理念的问题。价值理念的问题主要是讨论在合同的自由以及社会公正冲突。由于亚洲殖民历史的独特性，亚洲国家总是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踏出这种“受害者思维”，修正“社会公正”对于契约执行的过度影响。契约其实是一种“自己决定的自我行为”的权利，但对契约自由的制约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契约自由这一原则。

02
观点**Kirill Barskiy**

俄罗斯外交部官员；
政治分论坛嘉宾

亚太国家需要在互信互谅基础上共同构建 新安全范式

- 亚太安全面临新挑战，悲观情绪笼罩地区，例如网络安全
- 亚太安全体系缺乏一致性。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过度依赖威慑手段。
- 新亚太安全体系应当基于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和互谅。中俄边界地区裁军谈判是国与国之间互信互谅的正面典型。

03
观点**陈向明**

芝加哥大学伊利诺斯分校教授；
城市分论坛嘉宾

操控、加速和规模化：城市发展的中国 模式及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启示。

中国模式的城镇化表现出政府引导、速度快、规模大、范围广、程度浅的特点。土地扩展推动的城镇化既有利也有弊。其利表现为城市化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壮大了中产阶级的队伍，大幅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社会的开放度，促进了社会融合。其弊表现在效率降低、环境恶化、社会公平问题的出现，农业用地的减少，社会发展落后经济增长以及不可持续等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有选择的借鉴中国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

陈学彬

04
观点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金融分论坛嘉宾

货币超发成为各国治理危机的主要措施。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各国正在向通过国内超发货币来引导本币贬值的间接干预方式转变。

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超发货币的溢出效应严重。货币超发将导致对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外汇率大幅贬值，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无序竞争，需要寻求新的约束机制。

自平衡交互盯住国际货币体系构想。以一篮子货币取代单一货币作为名义锚，减少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各种货币交互盯住一篮子货币构成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外限制个别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对内限制个别国家超发货币及带来的溢出效应；根据通货膨胀修正实际有效汇率，根据贸易差自动调整汇率修正贸易失衡。



Keith Crane

05
观点

美国兰德公司环境、能源和经济发展项目主任；
能源分论坛嘉宾

可再生能源汽车燃料的前景与陷阱

可再生汽车能源燃料在未来的能源使用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压缩液化气的使用主要集中在火车动力领域，压缩液化气的使用因为成本等原因仍然限于公交系统和货车系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与法规的支持，随着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束，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与原料的成本有所上升。对于可再生燃料，诸如纤维素乙醇等技术上的挑战仍然是关键。

高津华

06
观点

上海财向私募股权投资平台执行合伙人兼总裁；
金融家俱乐部圆桌会议嘉宾

转型发展的误区

中国转型发展至今成效不高、进展不快，而且现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其根本原因就是所谓的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二、GDP崇拜，三、政府配置资源导致价格扭曲，四、没有建立起一个鼓励创新、激励创业的体制。转型发展存在“揠苗助长”、“夜郎自大”、“名不符实”等几大误区。我认为转型发展的当务之急已从下面两个层面入手：一、观念上的飞跃和突破，二、措施上的精准和给力。

07
观点**Hans Genbe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局长；
金融圆桌嘉宾

资本账户管理和金融管制是控制安全资产的两个方向。资本账户管理会造成复杂的欧洲融合问题。金融管制：之前人们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高度发达、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现在则管制越来越多。

跨境交易：一旦我们说到跨境交易，就会提到进行管制。比如 ABC 三个国家，希望在国家之间更好的调整和融合，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在国与国之间做一些控制，国境是一个重要的控制点。

最优金融区：只是一个金融区域，不是一个货币区域。

08
观点**何明升**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传播分论坛嘉宾

自由表达与法律规制：对微博谣言的一个实证分析。

微博谣言是一种未被证实的网络信息，在总体上存在两面性：“本质真实，但需要回应的”和“本质虚假，但需要澄清的”。网民发布信息的动机也存在两种可能性：“利己性恶意传播”和“利他性善意传播”。

微博谣言存在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为追求利益而进行的网络欺诈行为；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需要政府进行回应。

“谣言”是个人言论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应存在“保护”和“限制”的边界。“利己性”谣言传播者有着主观上的故意，明知此行为会侵害到他人或社会利益，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出现，这属于“法律规则”要解决的问题。

“利他性”谣言应该成为法律规制谣言的临界点。保护“利他性”谣言，就是遵从“法律规则”的合法性，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权；反之，如果限制“利他性”谣言则违反了法律合法性原则，使本应受保护的言论受到了限制，从而侵害公民言论自由权利。

09
观点**姜义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系教授；
文化分论坛主席

- 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对世界形势把握的三个阶段：“三个世界”的划分、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建立新兴的大国关系。
- 亨廷顿的理论对我们的启发：应该从文明的层面来看待国际关系。
- 在今天信息化的时代中，对国际事务而言，文明的作用和影响力将更加显著。
- 我们认识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最根本基础和前提便是承认每一个文明的独特价值，彼此之间相互包容，谋求共赢。





10
观点

孔灵芝

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公卫分论坛嘉宾

中国慢性病挑战与应对。

由于人口学和疾病谱的变化以及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慢病还处于一个高负担期，也还正处于上升期。中国建立了完整的慢性病防治体系。健康促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正在试点实施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也开展了具体的多部门合作，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人群三方的作用，比如社会各部门参与了健康城市的创建活动。此外，正在推广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12
观点

Jose Antonio Puppim De Oliveira

联合国大学高级研究员，《公共行政与发展》期刊主编；
公共管理圆桌嘉宾

环境服务中的公私伙伴关系：废弃物处理部门合作管理中的机遇与挑战

政府与国家组织是重要的，但是在现今时代需要与其他政府与行业进行协调合作。
双赢（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局面是可以使之存在的，但政府仍面临着几个主要的双赢阻碍：
缺少如何循环使用、降低浪费的方法；
缺少循环使用或者堆肥的应用或者应用所需的市场；
循环工作部门的非正规化；
社会缺少对公共部门的信任，部门腐败严重。
各个国家应当努力创造一种理想的伙伴关系：集体决定目标，在共识的前提下合作进行公共决策。
法性原则，使本应受保护的言论受到了限制，从而侵害公民言论自由权利。

11
观点

孟睿思

哈佛商学院；
环境分论坛嘉宾

中国环境监管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对环保的响应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需要协调解决人力资本不足。
公司与政府共同合作解决环境管理的问题。
中国不应仅仅执行国际标准，而且应该对本国的公司建立自己的环境标准。



13
观点**Jeffrey Schott**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城市经济分论坛嘉宾**地区贸易协定和中美贸易关系**

核心：中美寻求贸易一体化的路径将是殊途同归的

- TPP 致力于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涵盖内容广泛，希望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相比于 RECP，目标和内容相似，但法律约束力不同。
- 两个协定非竞争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其影响可以叠加，有很多国家同时参与两个组织。
- 美国并非用 TPP 来遏制中国，而是希望中国加入，希望通过贸易关系更好地展开竞争。
- 但 TPP 不可能成为亚太贸易关系模板，建议结合 TPP 和 RCEP 的优势，建立一个混合机制，形成独特的亚洲贸易模式，以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和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

14
观点**万广华**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
世经分论坛嘉宾**城市化与环境：亚洲视角。**

这次主要解决两个令人越来越担忧的问题——环境的可持续性与快速的城市化。亚洲拥有目前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城市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超过了其他地区，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城市人口增长率以及大量拥有高密度人口的大城市。因此，亚洲地区将会面临比目前更为严峻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拥挤、二氧化碳排放，基础医疗与水资源的不足，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不堪一击。但伴随着城市化的是中产阶级和有产者的兴起，服务业得到发展，生育率下降和教育程度提高，更重要的是绿色技术的创新。这些与城市化相关的因素与机制对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的双赢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探索与建立亚洲城市化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我对亚洲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环境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15
观点**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政治分论坛主席**创建促进和平发展的中国“和力”**

- 中国固有之“和谐”文化概念与合作哲学是创建“和力”的基础。
- 通过正确理解当今世界，意识到创建“和力”的必要性。全球化背景促使各国开展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项合作。双赢合作理念要求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寻求共同利益。各国应意识到彼此之不同之处，尽力维护利益平衡。
- 在经济、外交、文化、安全、国际政治等各方面都有实现发展“和力”的空间。



杨洁勉

16
观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智库圆桌嘉宾

新领导人当政后的一些政策趋向

- **连续性。**领导人连续性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主要包括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赢合作等。
- **概念的变化。**主要包括全球力量的世界视野、概念建设、重新定义战略机遇、更清晰的国家核心利益。
- **优先和实践。**包括更重视邻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处理地区热点问题的意愿、处理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坚定和灵活。
- **机遇与挑战。**机遇：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持续崛起；国际环境给予中国的机会。挑战：中国需要协调国内日益复杂和多元形势；海洋争端持续加剧；中国必须向世界展示其大国关系的成功；中国需要与整个国际共同体共存。

叶江

17
观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
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文化分论坛嘉宾

- 我们要谈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三者之间来寻求一种结合，来推进对全球的挑战和治理，国家机构、国际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乃至个人都成为推进国际制度积极变革的主体，而不断发生变革的国际制度则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良治（或善治 good governance）的重要载体。
- 中国儒家思想与全球治理理论统一于“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否定强权政治是“全球治理”与“谐世界”的共同特点。
- 全球治理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不断超越权力政治“国大必霸，国强必争”的模式，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来处理我们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的挑战。



张文朗

18
观点

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世经分论坛嘉宾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如何影响劳动力成本？

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在整体上尚未对工资造成压力，可能说明总体上仍未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结构性的劳动力供需问题存在，并对某些地区某些企业构成工资压力。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措施：1) 消除城乡劳动市场分割；2) 适当发展职业与技术教育；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左学金

19
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城市经济分论坛嘉宾

东亚各国比较竞争优势趋同与产业合作前景

- 过去 30 年，飞鹅模式可以解释东亚经济合作，中国充分发挥劳动红利优势，结合优惠政策，参与全球化。未来，东亚各国比较优势在融合，因为东亚各国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劳动力在长期存在趋同性。
- 东亚地区贸易前景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 1) 飞鹅模式向新贸易模式转变：推动合作新模式，充分利用产业规模；
 - 2) 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合作减少而竞争和敌对增加；
 - 3) 对策：东亚各国创造推动地区合作的环境，致力于市场融合。
 东亚地区应该加强技术合作，减少和消除各国企业兼并收购的制度障碍，加强研发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便利人才的跨国流动）。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

2013 年上海论坛共识

时代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性经济衰退正持续发酵，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举步维艰，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显著。面对接踵而至的挑战与机遇，亚洲正面临着新的契机。展望亚洲的未来，我们认为，亚洲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充分汲取经验，要利用自身的独特智慧和优势，克服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在差异中追寻共存与和谐发展，实现亚洲整体崛起，推动全球社会进步，贡献人类文明。本届上海论坛以“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为主题，所有与会代表就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广泛讨论，对亚洲的多元化发展达成共识，初步建立起亚洲和谐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架构。

亚洲智慧的核心是包容促团结、和谐创繁荣。亚洲通过长期以来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逐步出现了地区融合、和谐发展的良好趋势，亚洲各国必须相互尊重并凝聚起智慧，将之转化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念、战略、制度、政策与行动，用包容心解决矛盾，用团结的意愿处理争端，深化区内经贸合作，推动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让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让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亚洲需要更具前瞻性地引领科技创新。

走出世界性经济衰退、恢复并维持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性因素在于科技创新。众多迹象表明，目前已经显现出巨大增长潜能的信息产业与日渐发酵成熟的新兴能源产业，有可能通过全方位的融合，成为点燃新工业革命的火种。亚洲各国应抢占世界科技前沿，论证并实践新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持续性，用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度推动本国或区域内的科技创新，带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创造新的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带动经济

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亚洲需要更科学理性地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亚洲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的多方面原因，亚洲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拉动内需、抵御金融风险、促进一体化

等诸多挑战。

多年来，亚洲各国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多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尽管 2008 年危机以来，各国在保增长、调结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囿于市场经济成熟度不同、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制度缺失等内在因素，以及依附于价值链、产业链体系，一旦外需萎缩，导致失业增加、内需更加不足的外部因素，亚洲经济增长“外需过度依存，内需始终不旺”的根本特征没有改变。在亚洲各国内需不旺的情况下，目前仍然需要增加外贸出口，以保持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依然需要亚洲各国继续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合作，在 WTO 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框架下增加贸易，并从制度上推进亚洲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国际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对内则通过完善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提高自身的效率，提升对域外出口的竞争力。

虽然亚洲各国金融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但总体而言，亚洲国家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和欧盟



各国的金融市场，从而在金融全球化持续发展的格局中，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正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面对实体经济的挑战和契机，亚洲国家应通过加强广泛的合作，来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从而满足该地区相对贫困的社会大众对“财富安全性”的强烈渴望。另外，亚洲各国和地区需要针对一系列的新挑战，探讨出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地解决方案，共同推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金融合作向着更深层次迈进，缓解东亚地区金融体系不稳定风险，增强抵御外部市场冲击的能力。

相对于欧洲和北美而言，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还不高。而要切实提高亚洲经济一体化水平，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金融货币合作所推动的亚洲区域内主要经济体进行产业重组必将成为主要抓手。此外，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不同地区乃至主要城市充分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重构和区域协调发展也将为夯实中国长期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和打造亚洲区域协作火车头做出重要贡献。

三、亚洲需要更积极稳健地探索管理制度变革。

全面推进的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信息化和不可避免的老龄化为亚洲各国社会管理带来重大挑战，也为亚洲管理制度变革创造了重要机遇。

亚洲城市的发展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机遇，但其根本在于管理制度和理念的创新。在亚洲地区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城市管理的创新应对更加复杂的城市管理，建设更加智慧型的城市。同时亚洲地区需要通过社会体制的创新来应对包括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等社会生活变迁的挑战，创造美好和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以新媒体为标志的第四次传播革命，给亚洲各国带来了许多严峻的挑战，成为当下亚洲国家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网络信息时代的传播革命，冲垮了传统的在政府科层内部由上而下的信息管理方式，改变了权力金字塔中上下层级之间不对等的信息关系。面对这种情况，各国政府应该与时俱进，并加强协同合作，从调整战略观念开始，形成建立在新共识基础上的新安全观，进而从技术、制度以及战略理念三个层面来共同应对这一变迁。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应对这一网络信息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变迁，才

能在迅速变动的当代世界中，摸索建立、健全并逐渐完善一套适合现代信息社会的全新的新闻传播的规制与管理体制，促进和改善各国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推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进步，增加人民的福祉。

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最基本的人权。怎样的卫生系统和政策环境才能确保全民健康，是亚洲各国乃至全球共同关注的民生议题，也是各国政府的主要职责。目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越来越成为亚洲各国乃至全球健康的主要威胁，而老龄化进程则加剧了慢性病的发病率，也出现了慢性病患者年轻化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都已面临着慢性病的威胁，增加了全社会疾病治疗的经济负担。因此，亚洲各国需要通过合作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分享，探索具有各国特色的全民保健之路，寻求公平高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慢性病给卫生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四、亚洲需要更具耐心地促进区域事务合作。

在气候变化和法律方面，亚洲国





家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

加强国际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亚洲各国开展沟通、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方面。气候变化涉及到一系列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技术乃至国防等多方面的利益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气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减缓气候变暖，是一项现实而急迫严峻的挑战，也涉及到全球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在减缓气候变暖方面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可能会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久远的影响。各国政府在做任何有关减缓气候变暖的现实决策时，均面临着如何协调短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各国政府过去往往以不损害自身发展为出发点，靠“搭便车”的形式将减排负担转嫁到其他国家。因此，亚洲各国之间应积极寻求区域合作，加强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交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和治理亚洲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增强亚洲各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发言权。

法律智慧对亚洲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意义毋庸置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联合国建立以来，亚洲国家为保持区域的稳定、和平与安全而不断努力。在国际法的理念与原则层面，亚洲国家曾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减少争端，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在解决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争端方面，亚洲各国应通过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争端解决机制，依据国际法的原则来解决区域内的各种争端以及全球性的问题。同时，亚洲主要国家也应尝试，推进部分民事法律在主要国家的统一化，探索亚洲法律智慧的

交融与和谐的新途径，逐步使亚洲国家的法律合作与统一，拓宽到环境法、能源法、金融法、贸易法等法律领域。

五、亚洲需要更富韧性地推动地区和平稳定。

谋发展、促合作是当今亚洲的主流。亚洲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推动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历来不乏智慧，亚洲的政治思想和智慧在人类政治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亚洲一些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诸多领土、贸易、能源、安全和外交方面的争端。能否和平有效地处理这些争端，关系到亚洲长远的稳定与发展，更关系到亚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发挥。

解决当前存在的纷争，要立足亚洲，尊重和遵循亚洲人民共同价值观和习惯，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案例和经验，创造性地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要循序渐进，避免简单粗暴，要坚持主权独立与平等原则，以平等、和平、外交和谈判的方式解决纷争，同时，应将问题置于区域内部解决，坚持区域内自主解决的坚定立场；要以积极和建设性的视角看待诸多矛盾和问题，从合作、共赢、发展的角度逐渐削弱问题的消极面，使之转化为积极面，要努力促进亚洲一体化，实现共享价值观，将域内矛盾和冲突的性质与解决办法逐渐软化、弱化，以柔性方式和在共识基础上解决问题；要以史为鉴，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以面向未来、面向子孙后代的大局观，以寻求地区普遍和平、全面发展与繁荣为目的，致力于各类问题的解决。

上海论坛（2013）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欧美国家纷至沓来的危机，亚洲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亚洲的未来必将像历史和现实呈现出的一样多元多彩。历史经验表明，亚洲的活力要真正转化成亚洲崛起，就需要全亚洲团结起来，在多元中寻求共识，在和谐中实现发展。亚洲各国应充分尊重彼此差异，充分协调彼此立场，充分开展务实合作，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方面充分实现互利共赢。亚洲智慧，是全亚洲人民的财富，是亚洲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多元中实现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石。

上海论坛（2013）共识经复旦大学教授团队合作，精心打磨完成，于论坛闭幕之际由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宣读并发布，为上海论坛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上海论坛 (2014) 主题

主 题：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 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

时 间：2014 年 5 月 24 日 (周六) - 26 日 (周一)

地 点：上海

规 模：国内外学、政、商三界代表约 400 人

上海论坛 (2014) 期待您的支持与参与，

论坛最新动态请登录上海论坛官方网站 www.shanghaiforum.org 或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hanghaiforum> 查询。

关注亚洲

聚焦热点

荟萃精英

推进互动

增强合作

谋求共识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55664590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